

## 序 言

2019年3月7日至8日，本人应邀有机会去位于美国费城的长老会档案馆，经过二天的查阅，发现很多美国传教士留下有关杭州教会的珍贵的历史资料，这为研究杭州基督教历史发展提供很有价值的第一手史料。自从美国带回的杭州基督教资料以来，一直没有时间整理这些资料，只是在去年4月30日在思澄堂青年会聚会开了一次讲座。

在今年疫情期间，思澄堂教牧同工除了线上牧养之外，同工们建议我写一些杭州基督教历史与弟兄姊妹分享，也正好疫情期间在家也有时间，我欣然答应了。

根据从美国带来的杭州基督教部分历史资料，就以图文的形式，分成不同二十个主题。这二十个主题的内容涉及了杭州基督教人物、教会学校、教会历史事件、教堂介绍、传教士及基督教组织等等。

但愿这二十个主题的杭州基督教历史文章，能让读者从不同的侧面，来了解杭州基督教历史发展，同时也是杭州基督教会在不同时期的美好见证。

陈 伟

2020年10月12日于杭州思澄堂

## 一. 《从一副织锦画说起》



这个镜框是位于美国长老会档案馆的大厅，是一副圣城耶路撒冷的全景图。最初本人没有在意这幅画，但仔细看了一下上面有中文字，一下子提起我的兴趣；再往左边一看上面写着“中华民国浙江杭州都锦生丝织厂监制”的字样，我是来自杭州教会的牧者，在大洋彼岸的美国长老会档案馆，看到来自杭州都锦生的织锦品，让我感到非常兴奋和自豪。再往上一看的落款是一位名为张之江，在1936年圣诞节，将这幅圣城耶路撒冷的全景图，制成杭州都锦生丝锦品，送给了毕来思牧师和太太的。

在镜框旁也没有任何说明，让我产生的疑问：“为什么张之江用杭州的织锦，制成圣城耶路撒冷的全景画，送给毕来思牧师和太太呢？这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带着这些疑问，我查考了一些相关资料。



张之江（1882—1969），字紫珉，号子苕，别号天行，河北盐山人，西北军著名将领，中国国术主要倡导人和奠基人。为人重德守义，办事雷厉风行，刚决果断，是西北军五虎将之首，军中尊称大主教。曾任察哈尔都统西北边防督办、代理国民军总司令、国民政府禁烟委员会主席。他在禁烟时的决心和作风让群众赞为“第二个林则徐”。后任中央国术馆馆长。1936年选拔武术队参加第十届奥运会表演，奥运会执行主席特命为表演队摄制纪录片。建国后，任全国政协委员，1969年病逝。

同时张之江将军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接受基督教信仰，是受到冯玉祥将军的影响。被称为“基督徒将军”冯玉祥在军中，倡导“以教治军”，用基督教的教导来管理官兵。张之江曾经极力反对基督教，但在冯玉祥的影响下，最终成为虔诚的基督徒。张之江将军正式归主，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后，便严格按圣经的要求做人，无论

治军，还是生活，都活出了基督徒应有的品格，也尽上了基督徒应尽的本分。张之江将军受洗归主，取了教名叫“保罗”，就像保罗一样在外邦中传耶稣的福音。他曾于1925年花去30000银圆，印刷了10000册圣经，封面上烫有金字“此乃天下之大经也”。此批圣经分发给部下阅读，分送给一些愿意接受基督教信仰的慕道友。

1931年，杭州基督教会鼓楼堂在布市巷建了一座中国宫殿式的教堂，在圣坛两边有一副对联上面写着：“感谢耶和華恩賜生命水 讴歌弥赛亚声动浙江潮”据说是出自张之江将军之手。1933年还为杭州中国耶稣教会发刊的《新生命》题字。



都锦生（1897—1943年），号鲁滨，浙江杭州人。民国8年（1919年）毕业于浙江省甲种工业学校机织专业，留校任教。在教学实践中，亲手织出我国第一幅丝织风景画“九溪十八涧”。1922年5月15日，在杭州茅家埠家中办起都锦生丝织厂。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8月，日机轰炸杭州，都锦生丝织厂被迫停工，不得已将十二台手拉机转移到上海法租界，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租界，都锦生丝织厂被迫倒闭，加上重庆、广州等地的门市部亦先后被日机炸毁，都锦生悲愤交集1943年5月在上海病逝。杭州都锦生丝织厂主要生产丝织风景画，1926在美国费城博览会上获金奖，从此“都锦生”产品誉满全球。杭州都锦生实业有限公司(都锦生丝织厂)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丝织品工艺品生产经营企业，因其成品富丽华贵、色彩斑斓，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而被誉为神奇的“东方艺术之花”，是为中国四大名锦之一。



毕来思（Philip Francis Price），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1864年7月2日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1889年在本地协和神学院毕业。他于1889年10月6日被蒙哥马利长老会任命，并继续担任该长老会的一员，担任他的整个事工。1890年2月，来到中国传教。长期在苏州、嘉兴、南京从事福音布道和神学院教育工作。1954年在美国去世，终年90岁。

毕夫人名字是埃丝特·威尔逊（Esther Wilson）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在华工作长达53年。1888年，

随司徒尔夫妇来到杭州，积极投身于教会女校的体育教学。于1892年4月6日与毕来思在杭州结婚。婚后在嘉兴开辟新传教站工作，1912年随毕来思来到南京。成立金陵女子神学院并教授圣经和数学课程。1941年回美国

从以上查考的资料一串联，我明白了，原来张之江和毕来思夫妇有着共同的基督信仰，与杭州及杭州教会有缘。因此，张之江将军非常用心，特地用杭州的最有名的都锦生的丝织品，私人订制一副圣城耶路撒冷织锦画，作为圣诞礼物送给毕来思夫妇。我想，每当毕来思夫妇看到这幅织锦画，就会勾起他们在杭州生活、传教、结婚的美好回忆，真是一件独一无二的珍贵的礼物。为此，我就向档案馆的工作人员说明用意，并出一定的费用，请他们工作人员用全景高清的照相机拍下这幅织锦画，留下了美好的见证。

## 二. 《思澄堂的轶事—钟楼》

本人作为思澄堂的牧师，在这次查阅档案时，一定非常注意有关思澄堂的历史资料。在查阅时发现有几张老照片是有关思澄堂的，是以前没有看到过的。下面逐一的、连续的介绍。



这两张老照片是思澄堂的钟楼全景照，从两个不同的侧面拍的。思澄堂的教堂和钟楼是1927年建成的。这张照片估计在1930年前后拍的（1930年思澄堂才正式使用）。原钟楼所处的位置，据一些老信徒

回忆，就在现在教堂门口向前解放路的中间。从照片上看，这座钟楼共有三层，最下一层是教堂的正大门并与周围的附属房连成一片，正大门上方写着：“中华基督教会”六个大字；从正大门房小屋的楼梯可以上到二层，可以俯瞰教堂的内外；第三层原有一口大钟，星期天礼拜专门有人要敲钟，方圆几百米都能听见钟声，告诉人们礼拜开始了。钟楼的外观是采用中国典型的亭台楼阁，青砖石瓦，并与教堂建筑浑然一体，具有中国民族特色。可以说这钟楼在当时也是杭州街道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用现代的时髦话讲，成为必看的“打卡”地。

为什么思澄堂钟楼正大门上面写着“中华基督教会”而不是“杭州基督教会思澄堂”呢？在人们的印象中，教堂建筑总是西洋风格如“哥德式”、“罗马式”、“拜占庭式”，而为什么思澄堂的建筑采用中国风格的呢？。其实，这是根据当时中国基督教历史背景有关的。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为了能消除基督教的洋教色彩，中国教会进行的本色运动。“本色教会”的要求提出了，一是在教会组织、行政、布道和经济上，要以华人为主，传教士为辅。二是取消宗派区别。三是教会的神学思想和礼仪都必须中国化的主张。基督教如何与中国文化融合，被中国人民所认可，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文化既有外在的形式，更有内在的精神。相比之下，形式上的变化和融合更容易些，为了使宗教生活适合中国民情，中国教会领袖提出了在教堂、音乐、美术等方面柔和中国文化的主张。那个时期建筑的教堂开始不沿袭西方传统，而采用中国风格。在这历史背景下，1927年和1931年在杭州，先后建造了两座具有中国风格的教堂—思澄堂和鼓楼堂。

思澄堂原宗教背景是美国北长老会。1901年10月，在中国10多个长老宗教会就在上海集会，正式组成“中国基督教长老会联合会”，强调此举的目的是谋求中国教会的合一，到了1927年，由16个长老会教派协商建立“中华基督教会”。为了进一步推动本色教会、教会的合一和取消宗派区别，规定凡属长老会宗派都称为“中华基督教会”。因此，思澄堂的大门上面才会写“中华基督教会”的真正原因。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因解放路的拓宽，钟楼被无条件的拆除，留下历史遗憾，但有幸能在美国长老会档案馆看见了思澄堂钟楼这两张老照片。虽然钟楼不存在了，但庆幸的是思澄堂教堂主体建筑被完整保存到现在，成为杭州基督教会唯一的一座老教堂，它的存在对研究

杭州基督教历史、中国教堂风格，及杭州的本色运动，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实物。

### 三. 《思澄堂的轶事—张澄斋牧师与皮市堂》



这两张老照片，是从一位曾在杭州传教四十多年的美国传教士万克礼（Kepler Van Evera）的档案里看到的。我一眼就认出是张澄斋牧师，我怎么就知道这就是张澄斋牧师呢？是因为在2006年10月23日，张澄斋牧师的曾孙女（当时已有80多岁）张崇璋带着四女儿、女婿、儿子及外孙女，外孙子一共11人，从美国各地来到杭州寻根，来到思澄堂，这天也正巧是本人接待并带领参观了祖辈曾在杭州留下的足迹，如思澄堂、浙二医院、皮市巷、青年会。这次她带来一些祖辈的照片，其中就有张澄斋牧师晚年的照片。因此，让我有幸看到张牧师的尊容，这张照片就成为思澄堂很重要的历史照片，挂在思澄堂历史走廊上。

从这两张照片来看，应该是张澄斋牧师晚年照。在杭州某个冬日，他站在传教士住宅前和坐在屋内拍的。他身穿中国式的服装，脚穿一双棉布鞋，仪态大方自然，面容慈祥，满头银发，白色胡须，但有点消瘦，是很典型的中国老牧者形象；特别注意在右边的照片上看到，张牧师手里怀抱两位外国小婴孩，非常可爱。我想可能是张牧师走访传教士的家庭，也正好想得到老长辈的祝福，就让这两位婴孩和张牧师合影，成为永久的纪念。这两位婴孩是谁？叫什么？是哪位传

教士的后代？因照片没有任何说明，就不得而知了。



这张照片是和前两张照片放在一个档案里。从这张照片看到远处周边房子中间，有一处醒目的中西合璧的建筑，共有三层楼，窗户是哥特式的尖形拱窗，外加百叶窗，楼顶是中国式的屋檐角翘。这个建筑有什么用处，在那里的。在看到这张照片时，我一眼认出，这是杭州皮市堂的钟楼，钟楼旁应是显十字的礼拜堂。在我收集杭州教会老照片里，就看到有一张正面的皮市堂及钟楼的老照片，并请思澄堂老信徒牧师过的。这张照片拍摄角度，应该是从思澄堂后面的小塔儿巷拍的。

皮市堂是杭州最早的教堂之一。1864年11月美传教士葛宁与张澄斋由宁波来杭暂住马所巷圣公会会内，12月租皮市巷五开间楼厅一所作为礼拜堂。1890年因信徒增加，乃在皮市巷，建造皮市堂，1903年完成迁入新堂礼拜。钟楼的旁边应是礼拜堂，据思澄堂老牧者回忆，原皮市堂在皮市巷35号，礼拜堂座西朝东，西侧朝南有牧师住宅一所，三楼三底，后面另有厨房等附属房数间。皮市堂外墙原有一块“美国北长老会的墙界”的界碑，可惜的是在2012年皮市巷旧城改造时丢失了。

张澄斋牧师与皮市堂及后裔与思澄堂有着渊源的关系。张澄斋原名张迎奎，字澄斋，1839年出生于宁波的鄞县。14岁入甬北圣经书院肄业，1854年受洗。毕业后，先后在镇海、上虞、绍兴一带传道。1864年11月张澄斋与美国传教士葛链由宁波来杭暂住马所巷圣公会会内，12月租皮市巷五开间楼厅一所作为礼拜堂。1865年2月携家眷来杭州。1866年宁波长老会派教师葛珽及谢行栋两位来杭成立支会，举张澄斋为长老，并由宁波长老会封为宣教师主理杭州支会。1868年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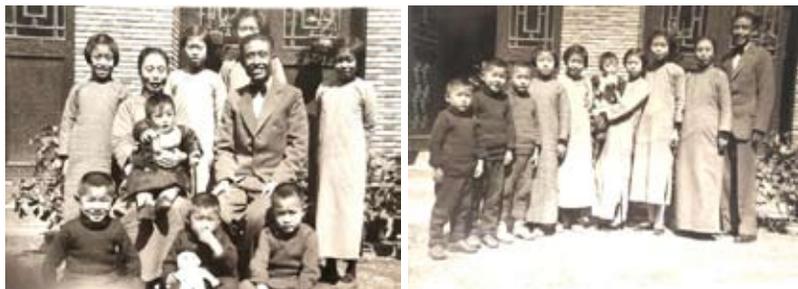
月教友推举张澄斋为牧师，成为该堂第一任牧师，也被誉为“杭州第一牧师”。皮市新堂成立之时，张澄斋独立捐建钟楼一座。1880年张澄斋兼任杭州育英书塾教师（后来之江大学）等职。1902年因病辞职。1917年8月22日蒙召归天，享年78岁。生有二子一女，其中长子张葆卿为有名的杭州医师、次子张葆初为上海的牧者。

1921年由于信徒人数增加，原皮市堂已不够用了，众人议再建新堂。为纪念其父张澄斋牧师，张家有意建造礼拜堂，当时张澄斋的长子张葆卿医生带头奉献一万银元，在国内募捐二万银元。向国外募得三万元，共六万元，就在原1872年丰乐桥教堂的地方重新建造。从1924年动工到1927年建成，为了成全张家的意思，起名“思澄堂”寓纪念张澄斋牧师。

张澄斋牧师的长儿媳（张葆卿师母）王梅侣是思澄堂的长老，张澄斋牧师的长孙（张葆卿长子）张信培也是思澄堂的长老。

张澄斋牧师祖孙三代都是侍奉神，服务于教会，这正是遵循了“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书24：15节）圣经教导，也真是当代基督徒所要效法的榜样。

#### 四. 《思澄堂的轶事—范光荣牧师的一家》



这两张老照片，也是曾在杭州传教四十多年的美国传教士万克礼（Kepler Van Evera）的档案里看到的。照片背面写着“Pastor Van Kwang yong and family 1938”从英文注明知道，这是范光荣牧师的家庭照，拍摄时间是1938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从这两张照片上看，是同一时间，是在秋冬时节，都是在思澄堂教堂正大门拍的。最上面边照片上，一共是10个人按年龄从大到小，依次从右到左排列一行，还有几个月大的婴孩怀抱手中；下面的照片，是按照中国传统的座位来拍照

的，父母坐在中间，稍大年龄的孩子站在父母后面，稍小年龄孩子坐在父母前面，最小的孩子怀抱在母亲怀里。范牧师夫妇生有四男四女八个孩子，从大到小分别是范罗兰、范海兰、范佩兰、范梅兰、范大卫、范保罗、范约翰、范雅各，前面四个女孩的名字很中国化，后四个男孩的名字取用圣经里人物的名字，一看就知道家里的父母是信耶稣的，即中国化又信仰化。这八个孩子中，最大的出生于1923年，最小的出生于1938年。

照片中，范牧师身穿一套西服，师母濮庆贞和女孩子身穿中式旗袍，男孩子身穿毛衣长裤，个个面带笑容，落落大方，自然，一点也不拘谨，这也许是对拍照已不是新鲜之事（我有收集好几张不同时期范牧师家庭照），虽没有华丽的衣着，但穿的干净得体，很有精神。那范光荣牧师个人和家庭究竟是如何呢？下面介绍一下。

范光荣牧师，是绍兴人。出生于1897年，其父为北浸礼会传道。1917年毕业于杭州蕙兰中学（是一所教会学校，现为杭二中），1920年毕业于沪江大学（教会大学），得文学学士学位。又继续肄习神学，毕业后任绍兴浸礼会所办越材中学教职。后调任上海老北门第一浸会堂教育干事，兼歌咏团弦乐队主席、主日学教员、堂会书记、浸会少年团顾问之职。1920年来杭，因未找到教会的合适工作，做过一段时间的教书育人工作，1930年前后，最初在杭州太平堂任传道工作，后又封为牧师，1930年，被思澄堂教会聘为首任牧师。1937年12月杭州沦陷，思澄堂成了杭州市民的避难所。1940年又在思澄堂开办私立明德中学。抗战胜利后，思澄堂每主日下午举行英语礼拜，这是杭州教会唯一的。1948年去美国哥伦比亚神学院读硕士学位。1949年8月，经香港、湖南转辗返杭，又主持思澄堂工作。解放后，杭州市基督教各教会联合成立“杭州市基督教反美爱国爱教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范牧师任副主席。他积极带领全市教会同工共同学习，共同长进。自1930年起，担任思澄堂牧师30余年，除了本堂工作外，还先后担任中华基督教会浙江大会副会长、杭州区会会长、上江分区会会长、之江大学校董、杭州基督教协进会教会事工组主席、杭州救济委主席、万国红十字会杭州分会董事、华洋救济会委员等职。19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农村改造，后因年龄大，体弱多病，回杭养病在家。1973年10月14日安息主怀，享年76岁。

范牧师的八个孩子都蒙上帝的祝福，个个都成才，为社会，为教会尽自己的所能，默默的奉献自己一生的美好的见证。培养得如此之

好，这主要是受家庭的影响及良好的教育是分不开的。我个人认为：

一是，基督信仰。他们从小生长在基督教化家庭里（祖辈和父母都是基督徒，父亲是传道人），在教会里长大，长大后基本上参与思澄堂诗班的服侍，如范保罗常在诗班里唱男低音，范海兰、范佩兰一直在诗班里弹琴等等），从小在他们心中扎下福音的种子，无论走到哪里都不离开主，正如圣经箴言书22章6节所说的“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二是，受父亲的影响。范牧师本人受过高等教育，文学学士和神学硕士毕业，留过洋，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爱好音乐，拉一手好的小提琴，当过老师，交际广，有见识等等。这一切，都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孩子们。在这八个孩子中，受父影响最深的是二女儿范海兰（最上照片中怀抱婴孩的，右边照片中最后一排的左二）和三女儿范佩兰（左边照片右四和右边照片最后一排的右一）。据范海兰回忆，她是1924年出生的，10岁时，父亲就培养她弹钢琴，并专门请老师教她钢琴。抗战时期，教会奉献日益减少。为了维持生活，范牧师利用教会的钢琴，由范海兰担任教员开设钢琴班，来增加收入。范海兰老师从少女时代、青年时代、中年时代，老年时代，一直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在思澄堂诗班弹琴，用音乐来侍奉神，直到90岁才退下来。现在蒙神祝福，在杭州第一社会福利院，安度晚年。三女儿范佩兰，从小学钢琴。长大后能要像父亲一样做个传道人，就考取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毕业后，由于当时的政治处境，只好又去报考无锡舞蹈学校，学习作曲和钢琴伴奏，毕业后，分配到上海沪剧团工作，最后又在无锡歌舞团工作，退休后，一直在上海基督教会沐恩堂司琴，直到无法做为止。范佩兰老师后来嫁给了上海沐恩堂的史奇珪牧师，他们是在神学院相识的。史牧师也是中国基督教圣乐专家，为许多的圣诗谱曲，如《新篇赞美400首》中，第9首《颂主恩光歌》，第78首《圣夜静歌》，第358首《邻舍就在身旁歌》等等，这些诗歌被中国教会广泛传唱。史牧师也是本人在上海华东神学院的老师，教过我们《智慧书》，上课风趣幽默，每次上课总引起同学们哄堂大笑，许多上海牧师给他取了绰号“滑稽牧师”。本人一有机会碰到史牧师总是对他说：“你是我们思澄堂的女婿”，他总是哈哈一笑。

三是，有良好的的教育。在当时，牧师的孩子就读教会办的幼稚园、小学、中学，都是免学费的，因此，孩子都有受教育的机会，甚至进入中高等教育。大女儿范罗兰是华西协和大学英文系毕业，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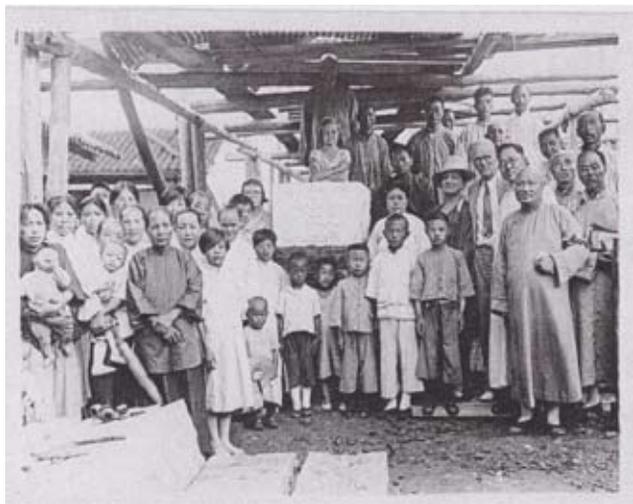
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做翻译，最后是北京十八中学的英文和音乐老师。二女儿范海兰是苏州景海女子师范幼师毕业，后是杭州华丰造纸厂的子弟学校幼儿园的老师。三女儿范佩兰，曾毕业于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后又读无锡舞蹈学校学作曲和钢琴伴奏，最后在无锡歌舞团工作。四女儿范梅兰，毕业于贵阳护士学校，后到南京军区医院当护士长。大儿子范大卫，毕业于山东医学院小儿科，就留在山东当医生。二儿子范保罗，浙江医科学院眼科毕业，先在福建铁路医院当眼科医生，后调回杭州铁路医院。三儿子范约翰，杭州卫生学校毕业，在宁波医学公司当科长。四儿子范雅各，杭州第十中学高中毕业，进入杭州某工厂当工人，就留在范牧师身边。目前，范牧师的八个孩子中，只有范海兰和范保罗还在世。

从范光荣牧师的一家来看，正应验了上帝在圣经里说的“义人后裔必拯救、必得福”（箴11：21节，创28：4节）的应许，神的话是永远信实的，神的应允永不改变。

## 五. 《1931年的鼓楼堂》

在这次查阅杭州基督教历史档案时，发现在美国传教士万克礼（Kepler Van Evera）的档案里，有许多有关鼓楼堂的老照片，大部分都是第一次看见，使我兴奋不已，好像这趟美国之行是为了鼓楼堂而去的。这些照片从上个世纪二十代至五十年代初，填补了鼓楼堂历史照片的空白，并且为2019年9月的《鼓楼之声—纪念鼓楼堂复堂四十周年讲道集》一书，提供了大量的照片。





以上这两张老照片是1931年正在建造新的鼓楼堂时拍的。一张是有三人站在房屋上，这三人有可能是负责此工程的监工、施工者和设计者。据史料记载，此工程委托原址在浣沙路泗水芳桥附近营造厂李协昌负责施工建设。三个人的后面是刚浇灌好的梁柱，表明此建筑工程将要大功告成。因此，三人就一起拍照留念，留下历史见证；另一张照片是有许多男女老少及几位传教士，欢聚一起，都围绕在一块“房角石”的周围。一般教会建造新的教堂，都会在教堂转角镶嵌一块“房角石”。“房角石”（Cornerstone）一词取自圣经，圣经里提到的房角石，大多指的是耶稣（弗2:19-21，彼前2:6-7），意思是盖房子时，基础的第一块大石头，用以定位，其他石头，依次挨着房角石堆叠，也寓意着教会的根基要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任何风吹雨打都不会摇动。鼓楼堂的“房角石”是镶嵌在教堂的东南面，一面是有一个类似发光的十字架（见照片上的），这十字架也成为现今鼓楼堂的Logo；另一面是“基督乃普世之光 民国二十年”。可惜这块房角石，在1998年鼓楼堂拆迁时遗失了，现有的是新做的。

以下这两张是1931年鼓楼堂建成时的照片。一张是鼓楼堂新堂的全景照。教堂建筑面积为1535平方米，高二层。礼拜堂外型是一座飞檐翘角的建筑，屋面覆盖绿色琉璃筒瓦，混凝土框架结构，青砖实砌墙，四壁置有大幅钢窗。大门上方有一块匾额，上面写着“礼拜堂”，门罩具有徽派风格。内部顶面为宫廷彩绘雕花图案。讲台两边柱子上有一幅“感谢耶和華恩賜生命水，謳歌賽亞亞聲動浙江潮”对



联。教堂转角白色的就是“房角石”。整个教堂建筑风格具有中国宫殿式。至于为什么当时鼓楼堂要建一个中国风格的教堂的历史背景，我已在之二中的《思澄堂轶事—钟楼》已说过，在这里就不再重复；另一张是“杭州鼓楼教会启门纪念”照。原来本人手中有一张这照片的明信片翻拍照，不是很清晰。这是一张原照，清晰度很高，于是就叫档案室的工作人员复印一张，保存留念。从这张照片上看，来了许多男女老幼的中外信徒，其中除了鼓楼堂信徒外，也有外堂同一个宗派（美国长老会）的教牧同工及信徒一同来庆贺，如思澄堂范光荣牧师（台阶最后一排左二）及胡山堂的邱金陵牧师（台阶二排右二）。大家正唱着赞美诗，整齐列队步入新堂，感恩赞美神。在教堂南侧还有一幢房子，是教堂附属用房，属于教会的社会服务机构“公益社”，共有三层，与教堂建筑浑然一体。

1931年的鼓楼堂，在1998年5月，由于城市建设中河高架路的需要，被拆除。鼓楼堂易地重建工程与2002年12月26日正式起动，到2004年9月竣工。但留下了一些遗憾：一是原鼓楼堂的宗教背景是美国北长老会，现主堂设计成了“英国圣公会”的为宗教背景；二是原鼓楼堂讲台两边的名人手迹的对联被拆毁，以及房梁的彩绘及房角石都没有留下来。虽然，在新堂的一楼建了一个“堂中堂”，里面的彩绘、对联与旧堂一致，但都不是原汁原味了，已失去了历史价值。不过，还留下一些老物件，如讲台、会众长椅、小礼堂的门和门罩。总算是留下一点历史遗迹。

1931年的鼓楼堂如果能保留至今，我认为：一定是教堂中国化的典范；一定是中山南路传统文化的亮点及风景线；一定是杭州历史文物保护单位建筑。但愿今后杭州教会不再有这样的遗憾！

## 六. 《杭州第一处自立教会——“中国耶稣教会”》



这张照片是1934年中国耶稣教会职员退修会的合影照。这里的职员相当于现在教会的执事或堂委委员，是由教会的教牧同工及信徒代表组成的，也是教会的骨干成员。退修会（英语：Retreat；又称为避静）可解释为：基督徒面对俗世之价值观或事物对信仰之价值观产生冲击、混淆，而择一宁静平和的环境，专注身、心、灵在信仰的建造，回复与上帝有合宜的关系。一如圣经新约中福音书所提，耶稣会避开人群，独自或带着门徒去亲近神。退修会是乎成为杭州教会的传统，现杭州基督教两会每年都组织杭州城区教牧同工的退修会。从照片上人们的衣着来看是冬天拍的。一共有25人，其中几位是中国耶稣教会的创建人，如周梅阁（照片一排的左三）、方桐生（照片二排右五）、朱孔阳（照片二排左六）。在照片第一排左四，坐着唯一的一位外国人，这人是美国传教士王令赓（E. L. Mattox），他曾当过之江大学的校长，与周梅阁牧师在之江大学的同事。我想是应周梅阁牧师之邀，作为这次退修会的讲员。

“中国耶稣教会”对于广大杭州的信徒是非常陌生的，也非常不了解的。为什么说是“杭州第一处自立教会”？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要建立自立教会的呢？下面介绍一下。

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叶，中国教会开始兴起自立运动，它的盟

生，与当时的中国形势出现的一些转折性的新变化有关，这一时期出现先是庚子事变、八国联军入侵、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的签订及义和团的失败等等，不仅使一般的民众进一步的觉醒，而且使中国的基督徒们也开始觉醒，一些爱国的基督徒受到很大的刺激，不少原属外国差会系统的教会宣布自立自养，自立教会几乎同时在华南、华东及京津等各地区产生，自立运动开始的得到迅猛的发展。在这时期自立运动影响最大的是，俞国桢于1906年在上海创立了“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社会反帝斗争日趋高涨，不少爱国信徒也投入运动，尤其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非基运动的大方向从批判基督教转向批判帝国主义利用不平等条约侵略中国，对基督教的方针有了转变，是中国基督教的许多团体和教徒逐渐提高了爱国觉悟，认识了帝国主义侵略真相。他们为基督教被称为“洋教”，基督徒被称为“洋奴”而感到羞愧，表示要和帝国主义划清界线，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中的保教特权。各地教会纷纷发表宣言，提出反帝，废约，收回教权，脱离差会，成立自立教会等要求。1926年国民革命进入高潮，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外国传教士纷纷逃离，教会自立运动更加发展。

在全国自立运动蓬勃发展和影响下，1927年11月24日杭州长老会湖山基督教堂，长老会皮市耶稣教堂，浸礼会淳佑桥真神堂三个教会宣告独立合组为“杭州市中华基督教会”，其人数占杭州信徒总数1/3，并于12月4日下午2点半假上皮市巷耶稣教会堂开成立大会。1929年，以朱孔阳、方桐生、盛素贞、汪俊生、马瑞微、李郁文、裘之春、吴夏美、田宝生、周梅阁等为首，共同发起自愿捐款赁屋，创立“新民堂”，嗣后改名“中华基督教会”。1931年又集资在西浣纱路20号购置地产，建造3层楼房1幢。为了表明教会本色化，为了便于其他教会相区别，改名为“中国耶稣教会”。聘周梅阁牧师（尽义务、不拿工资，在建堂中奉献最多）为教务负责人，并以组成7人堂务委员会，建立杭州市第一处自立教会。1938年，教会遭到日军的破坏。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又重新修复。1949年3月，周梅阁牧师因年老力衰。经湖山堂牧师邱金陵推荐，聘请杨雅各牧师来堂负责。1958年秋杭州开始实行教会联合，合并为湖山、思澄、鼓楼、南星桥、救恩堂5个堂。在中国耶稣教会创办十一电讯器材厂。后来又成为杭州市三自爱国会的招待所，最后因旧城改造被拆除了。



上面两张图片，一张图片是中国耶稣教会的刊物《新生命》，是1937年3月31日出版，编辑部就在西浣纱路8号，也就是在中国耶稣教会内。《新生命》刊物是1928年创办的。刊物内容主要是教会的一些活动、事工的报道及灵修、查经、讲道文章等等。在这期的目录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周梅阁牧师的自述》的文章。在这之前，我一直在没有找到有关周梅阁牧师的生平资料，却在这里看到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从这篇文章得知，周梅阁牧师，是杭州人，9岁时，父亲送他去杭州育英义塾（教会学校）读书，直到19岁毕业。1897年，29岁被育英书院（母校）聘为教员。34岁按立为长老。39岁任育英书院总理（教务长）职，并立志做专职传道，到南京金陵神学院进修三年神学课程。49岁，去位于美国纽约圣经专科大学读神学三年。回国后，任杭州湖山堂牧师两年，后因病辞职，58岁那年，开始游历俄国，芬兰、欧洲各国，以色列、埃及等地。59岁，创建杭州市中国耶稣教会，并担任义务牧师。

另一张图片是我在一本名为《1909年浙江杭城育英书院的毕业纪念》书中看到的，图片中有四个人。左二身穿中式服装就是周梅阁牧师，当时是育英书院的教务长和教师；左一是费佩德（Robert. F.Fitch）当时是育英书院教师，后来在1922-1931年担任之江大学校长；右二是王令贻（E.J.Mattox），当时也是育英书院的教师，后来在1911-1916年担任之江大学校长；右一是马尔济（A.W.March）当时也是育英书院教师，后来他与学校的合作持续了40年。从这张图片可以看出，周梅阁牧师很有中国情怀，虽然他所担任的学校是美国长老会办的，校长与教师基本上都是美国传教士担任的，但他没有穿当时非常时髦的西服，而是穿中式服装，来证明我是一名中国教师。这种中国情怀深深进入他的心里，以至于影响到他要办一个完全是中国人自

立的教会。终于1931年在杭州建立第一处自立的教会。1949年周梅阁牧师在杭州去世。

中国教会真正成为自主的教会，是在1950年吴耀宗等40位基督教代表人物，发起的中国“三自”爱国运动。这运动是要彻底实行中国教会的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原则，建立自办的教会。中国教会有今日的光景，与中国教会的前辈为此努力践行是分不开的。

## 七. 《牧师世家》



这张老照片是在查阅档案中无意发现的。这是一张谢志禧牧师全家与亲戚合照。当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时，我只认得谢志禧牧师，其他人我都不认识，我只好把照片发给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学院赵晓晖老师（他曾来思澄堂找过我），他是专门研究谢颂羔生平轶事，并写专文《将天国建在人间》发表在2017年第三期《天风》上。后来他把注明人名字的照片再次发给我，我才知照片上是哪些人物。从这张照片上人物的穿着来看应该是在清末，约在1908-1910年之间。拍摄地方有可能是谢志禧妻子的娘家人来杭州走亲戚时，难得在一起，就在照相馆拍一张全家福。从照片上第三排左起是：谢志禧、包保玉大弟（谢志禧的大舅子）、谢志绍（谢志禧的二哥）、包保玉小弟（谢志禧的小舅子）、谢颂羔（谢志禧的长子）；第二排左起

是：谢雅梅（谢志禧的长女）、包保玉（谢志禧的妻子）、包保玉之母（谢志禧的丈母娘）、包保玉弟媳与儿；第一排左起是谢颂义（谢志禧的二儿子）、谢静梅（谢志禧的小女儿）、谢颂三（谢志禧的三儿子）。谢志禧夫妇一共生了三儿二女。男孩的名字很信仰化，如谢颂羔有歌颂神的羔羊之意，谢颂三有歌颂三一真神之意，谢颂义歌颂神的公义之意，一看就知出生于基督徒家庭。为什么说谢志禧一家是牧师世家，与杭州教会有什么关系呢？

首先是谢志禧父亲谢行栋（1825-1895），他是宁波长老会最早的传道人之。是浙江鄞县人，早年师从丁韪良。1864年，按立为牧师被称为是“美国长老会之第一牧师、殆亦为耶稣教会中华第一牧师也”。先后在宁波、余姚、绍兴、南京等地传教。1866年和1868年与教师陶锡祈、葛璠一起被宁波长老总会委派到杭州，先后建立长老会杭州支会和按立张澄斋为牧师（被誉为“杭城第一牧师”）。

其次是谢志禧有两个哥哥，谢志咏和谢志绍（照片中第三排右二）也都是牧师，长期在宁波和绍兴地区传道。



谢志禧

谢志禧（1863-1937），1882年毕业于杭州育英书院，约1893年来到杭州皮市巷教堂（思澄堂前身）任传道将近二十年。1913年按立为牧师。同年应宁波长老会府桥街的“府前堂”所请，任该堂牧师二十四年，直到1937年。

谢志禧的长子谢颂羔（1895-1974），生于杭州。皮市教堂便是他从小生长的地方。1911年，谢颂羔从杭州育英书院毕业，听从父亲的安排去上虞一所小学任教，1917年于苏州东吴大学毕业，次年赴美国的奥朋大学（Auburn University）修读神学，1921年毕业，同年被按立为牧师。1922年在波士顿大学获硕士学位。1924至1926年间在美以美会（Ame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书报部任编辑，负责编辑《青年友》。1926年夏到上海广学会（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任编辑，直至约1952年辞职。先后编译出版了《正义是什么》、《世界著名小说选》、《学道入门》、《上帝眷顾世人吗》、《圣诞之书》等作品，



谢颂羔



谢颂三

谢志禧的三子谢颂三(1900~1989年), 1914年, 进苏州东吴大学附属中学, 毕业后继续在东吴大学求学。在校时曾任学生青年会会长、学生布道团长。1924年谢在东吴法科毕业, 获法学士学位, 当年赴美。在纽约州奥朋神学院学习, 1927年毕业, 获神学学士学位。同时由美国长老会按立为牧师。1928年回国后, 担任上海青年会德育部主任干事, 一年后担任苏州东吴大学教师。1932年起担任监理会基督教教育部执行干事, 1941年至1958年担任上海慕尔堂主任牧师。1941年至1951年曾任上海基督教联合会会长。1958年上海基督教实行联合礼拜, 谢曾任黄浦区联合礼拜筹备委员会委员。谢著有《儿童主日学教授法》, 并曾把吴雷川著的《墨翟与耶稣》一书译成英文。

另外谢志禧的小女儿谢静梅, 在宁波甬江女中求学时, 她内心受到圣灵感召, 毅然决志献身于主。上世纪20年代末, 中学毕业后, 她告别父母, 远去中国边陲云南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传福音18载。抗战胜利后, 她返回宁波, 在母会槐树堂事奉主。与老母同住, 一生独身。长女谢雅梅嫁给了上海清心堂汤仁熙牧师。

从谢家祖孙三代来看, 真是牧师世家, 不仅把基督教信仰传给子孙后代, 而且还献身于基督教事业; 不但遵循“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華”(书24: 15节)圣经教导, 并且在现实生活实践中能活出美好的见证。这些都是我们当代基督教徒所要效法的, 同时激励我们更加爱主, 羡慕主工; 也盼望着中国基督徒也能够一个家族, 一个家庭, 甚至几代人来侍奉神, 服务于教会, 并把基督信仰一代一代传扬下去。

## 八. 《1909年育英书院的学生李培恩》

在查阅档案时发现一本《宣统元年腊月浙江江城育英书院毕业纪念》册子。这是我看见最早有关育英书院的资料。里面有关育英书院老照片、历史记载、旧时毕业生名单及正科各级的学生介绍等等。为研究育英书院的提供第一手资料。接下来我会陆续介绍里面有关育英书院的方方面面。



这张照片是1909年前的育英书院的全景照。一幢二层西式洋楼数间及后面的附属房屋和操场空地，规模宏敞。正大门上清楚看到“育英书院”四个大字，证实了的确是“育英书院”的校舍。

育英书院是一所教会大学，它的前身是美国长老会于1845年在宁波创办的崇信义塾，也是浙江省第一所新式学校。1867年从宁波迁至杭州皮市巷，两年后迁至大塔儿巷，更名为育英义塾，有英才教育之意。1897年又更名为育英书院，学制分设正科、预科。正科为6年，大学程度。预科五年，中学程度。标志着它成为了浙江省第一个新式高等学府。

1902年学制改为正科由6年改为5年，预科由5年改为4年。1911年育英书院迁到钱塘江边新校区，更名为之江学堂。1914年又更名为之江大学。直到1952年止。



这张照片是1909年时的李培恩，当时只有20岁，是育英书院正科四年级学生，也可以是毕业照。照片上李培恩身穿中式带有牡丹图案的丝绸衣服，头戴西瓜帽，典型的清末男孩子的打扮，显得雍容华贵；长的眉清目秀，略带忧郁的眼神，也许是他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从小经历了许多生活的艰辛的缘故吧。曾有育英书院校长裘德生(Judson,J,H)夫人（教授音乐课），在她的一份报告中曾提到“李培恩

(Lee-Ba-en)是一个为教堂弹风琴的学生”。

其 智 可 及 也 其 愚 不 可 及 也	科	嚴	年	丑	鴻
	四	州	級	年	甫
	年	府	丙	五	李
	級	中	午	月	陸
		學	任	初	恩
		堂	青	二	浙
		教	年	日	江
		員	會	甲	仁
		兩	會	辰	和
		年	長	入	人
	己	丁	育	生	
	酉	未	英	於	
	重	離	正	光	
	入	院	科	緒	
	正	充	一	己	

左边的文字是正科四年级的李培恩的个人历史。从个人史的文字记载得知：“李培恩是浙江杭州人，生于1889年5月31日，1904年进入育英书院正科一年级，1906年任青年会会长（是学校青年会，成立于1887年），1907年离开书院去严州府（现浙江建德梅城）中学做教师两年，1909年重回育英书院正科四年级。他那种聪明，别人可以赶得上；他那种装傻，别人就赶不上了（这句话是常称颂别人善施韬晦之计。出自《论语·公冶长》：“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最后这句话应该是对他个性的评价。

李培恩（英文名Baen E. Lee）1910年从育英书院毕业后，他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就业，后赴美国留学，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商科硕士学位和纽约大学商业管理科硕士学位。回国后，任商务印书馆编辑。1928年，受聘于之江大学参与管理工作，并被聘为副校长。1931年正式接任校长之职，是之江大学创办以来第一任华人校长，直到1949年。解放后，李培恩离职回上海。1958年6月28日病故于上海南京西路家中。

李培恩不仅是一位教育家，同时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曾任之江堂的长老，曾任杭州基督教青年会副会长及扶轮社的会长。

李培恩作为教育家，学生桃李满天下，为杭州的高等教育作出很大的贡献；作为基督徒在世人面前，为主作为美好的见证；我更为他是地道的杭州人而感到自豪。在杭州基督教人物中，虽然神兴起一些土生土长的杭州人来传道，如周梅阁牧师、孙锡培牧师、王彼得牧师、王锡安牧师、李明馨教授等等，但绝大多数人都来自宁波、上海、江苏、温州、江西、绍兴等地。在杭州教会的基督徒中，杭州本地人比例相对比较少的。但愿神能在这块土地上，兴起更多人来传扬主的福音。

## 九. 《1909年育英书院的教师方桐生》



这张图片是1909年育英书院的阶梯教室。教室宽敞明亮，可以容纳一百多人，上面还有挂有四盏煤油灯，供师生晚间在这里上课或自学，也可以举行全校性的讲座课等等。有关育英书院的发展历史在之六中已经介绍了。育英书院的教师分为西教师和国教师，西教师一般指的是来自英美的传教士，国教师是指的华人，有些是在母校毕业后，留校当老师的。

右边图片是1909年育英书院的教师方桐生，当时是26岁，教数学和物理的。他也是1905从育英书院毕业的，毕业后在母校教书。从照片看，方桐生表情略显严肃，身穿长衫，带着眼镜，显然是教书先生的打扮。曾有育英书院校长裘德生(Judson, J, H)夫人（教授音乐课），在她的一份报告中曾提到“方桐生领着孩子们唱歌，并使他们合上节拍”。



方桐生1883年出生于杭州，6岁时就送进私塾念经书，在14岁时，听说育英书院是所新法教授，即往应考，幸得录取，甚感满意。1900年，他17岁时，他的父亲突然逝世，于是他的学费和生活费，全告断绝，于是向校方请求为自助生，半工半读，用自己劳力以换取学费与生活费，在当时则为创举，极为人轻视，方桐生想以劳动争取学业，则应以为荣，不当以为耻，故淡然处之。1905

年育英书院毕业，1907年与周雪贞结婚。毕业后，母校留充为数理教员，并兼任杭州市第一中学等音乐教员。1918年，上海商务书馆聘为仪器部主任，遂由教育而从商至1924年，又改就明德小学校长，任职三载，后任杭州正则中学校长，维持十有余年，直至1937年抗战前。在1938年日军将逼近杭州，不得已趟避内地，时年已五十五岁。窃念生平从事教育，亦不欲再改就他业，即耐心度着极清苦的生活，等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返杭。回杭后，见杭州首创自养自传自主的中国耶稣教会，除存轮廓外，被日军摧毁无遗，于是方桐生用了二三年将其修复，于1949年告退，安渡晚年。1961年1月1日去世，生有六男二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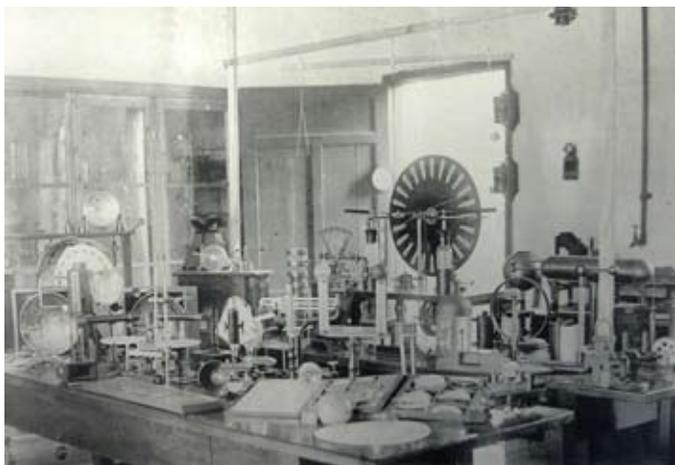
方桐生自幼笃信耶稣，看到教会为外国人掌管，其作为有背基督博爱平等之本旨，于是在1927年联合创办自立的中国的耶稣教会（有关中国的耶稣教会的历史背景已在之六中讲过）。方桐生是杭州基督教青年会早期发起人之一，1913年任杭州基督教青年会临时董事会的董事，自从1914年第一届董事至1934年第二十一届董事，方桐生连续20年担任青年会董事。

2014年10月5日上午，方桐生的孙女蒋方智怡（蒋介石的孙媳妇，蒋经国五儿媳）和方家亲戚一起来到思澄堂礼拜，张效法牧师和笔者一起接待了她，并由笔者陪同还参观了杭州基督教青年会。此次来杭的目的是祭奠方家祖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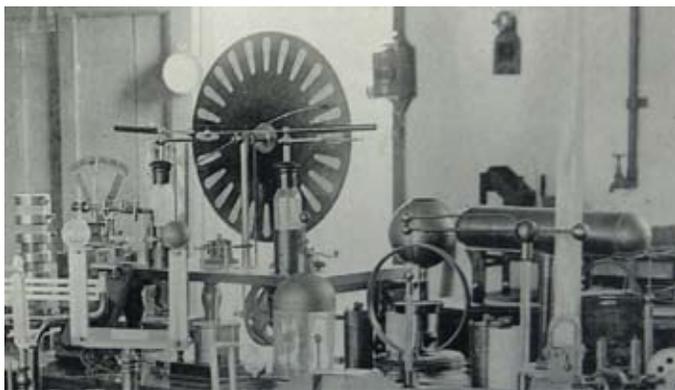
育英书院培养的学生主要从事教会工作和教育工作，如在之六讲过的周梅阁牧师即从事教育工作，又从事教会工作；之八讲过的李培恩从事高等教育工作；之七讲过的谢志禧牧师从事教会工作等等。因此，为杭州、浙江乃至全国培养了许多教会人才和教育人才。

## 十. 《育英书院里的“高科技”》

下面图片是育英书院的科学仪器实验室，里面摆放琳琅满目的各种科学仪器。从摆放的科学仪器来看，初步判断大致有光学仪器、物理性的仪器、计算仪器、天文仪器、化学仪器等等。这里面的科学实验仪器具体究竟是哪些东西？科学名称是什么？于是，笔者就在网上、图书馆及科技馆查相关的资料，并且用这张照片对书上或网上相关的照片去对比；再根据育英书院的裘德生(Junius H. Judson 1852-1930)校长，在他晚年写的回忆录中，有一篇《我在杭州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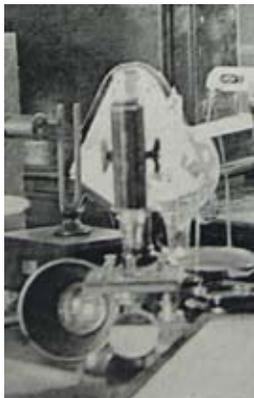
文章中，提到他在 1885 年夏天回国休假，从美国回来时，弄到了一台有两匹马力的希普曼牌蒸汽发动机、一台旋转车床和大量的木匠铜匠的工具。在 1905 年秋天，在美国休假完返校，带回了新的科学设备，包括 X 光机的全部装备、无线电报、引擎、气压表、显微镜和其他小型设备，以及有关科学仪器实验的趣闻记载，来推断出有些科学仪器大致名称。若有错误请读者指正。



这是一套起电设备。起电机又名感应起电机，是一种能连续取得并可积累较多正、负电荷的实验装置。感应起电机所产生的电压较高，与其他仪器配合后，可进行静电感应、雷电模拟实验、演示尖端放电等有关静电现象的实验。照片最左边的是伏打电池，是提供连续的电流的第一种电源，是十九世纪最重大和最有影响的突破之一；最

右边圆筒式起电机；中间是圆盘式静电感应起电机。育英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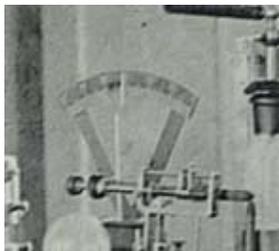
校长裘德生在他回忆录中有关静电实验情景,文章中这样写到：“我带回来的东西里有一台静电机器，它能够放出三四英寸长的电弧。一天，有三四个官员应邀到学校来参观，一位客人被请求坐在一张绝缘的凳子上，他身上通电以后，我用手指触碰他的耳朵、鼻子和身体的其他部位，每碰一下就会跳出电火花，他惊跳起来。我用调羹盛上酒精请他碰一下，他一碰调羹，便产生电火花并点燃了酒精。这个实验对于这位文人出身的官员来说有点过分了，他从凳子上站起身来，不知所措地喃喃自语：“稀奇得很……”做这种试验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了解这个学校在教授一些什么样的课程，并且消除他们的偏见。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失望，这几位文官经常访问我们学校，并且在后来创办他们自己的学校时，也以我们的学校作为模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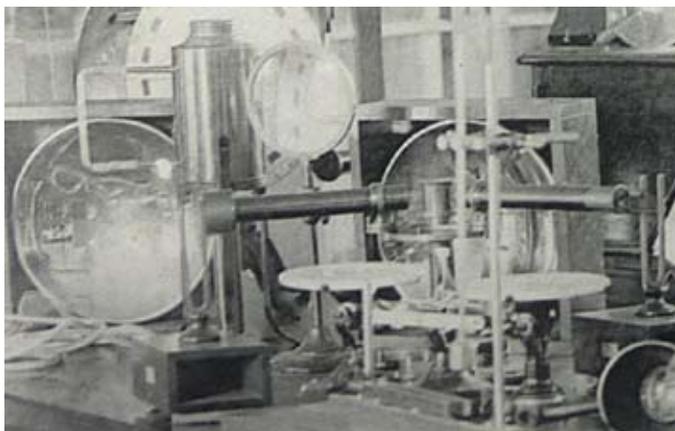


这是显微镜。显微镜泛指将微小不可见或难见物品之影像放大，而能被肉眼或其他成像仪器观察之工具。日常用语中之显微镜多指光学显微镜。放大倍率和清晰度（聚焦）为显微镜重要因素。显微镜是在 1590 年由荷兰的詹森父子所首创。在裘德生回忆录，有一段显微镜的趣闻：“学校购买了一个很好的显微镜，它在招待来访者时起了很大作用。我记得有一次展示用显微镜观测的幻灯片，其中有一张幻灯片是有关虱子的。有一位客人建议，用显微镜来观察一只活的虱子也许会更有趣。还没有

等他说完，就有人抓了一只活的、肚子滚圆的虱子，它成了一个精彩的观察对象。”

这是六分仪座，通常用它测量某一时刻太阳或其他天体与海平线或地平线的夹角，以便迅速得知海船或飞机所在位置的经纬度。六分仪的原理是牛顿首先提出的。六分仪具有扇状外形，其组成部分包括一架小望远镜，一个半透明半反射的固定平面镜即地平镜，一个与指标相联的活动反射镜即指标镜。在裘德生校长的回忆录中写到：“学校还得到了一个六分仪，在以后的好多年里，人们测量到了精确的杭州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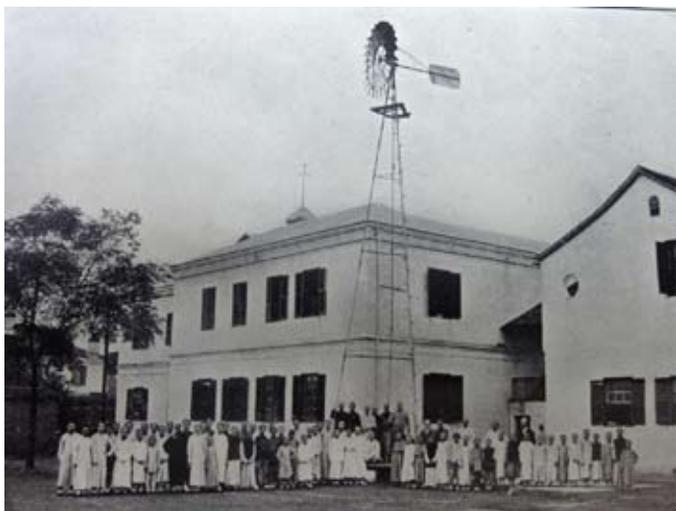
这是光谱仪器。它是利用光的色散、吸收、散射等现象得到与被分析物质有关的光谱，从而对物质成分、结构进行分析、测量的物理光学仪器。这是光谱仪器，利用光的色散、吸收、散射等现象得到与被分析物质有关的光谱，从而对物质成分、结构进行分析、测量的物理光学仪器。



这是二阶杠杆（上）和一阶杠杆（下）。杠杆是一种简单机械。在力的作用下能绕着固定点转动的硬棒就是杠杆。如天平是等臂杠杆所以两边的质量相等。

右图从形状上看应该是气压表，在照片里是挂在门上的。气压表是用来测量气压的仪器，在气象学中被广泛使用。气压表有多种造型和原理。因此它是压力表的一类。气压记是由气压表发展出来的仪器，气压记可以用图表或电子方式记录一个地区的气压的时间性变化。众多测量气压方法配合天气图用于帮助查找地面低压槽、高压系统和额叶界限。





这张照片应该是 1909 前拍的，是育英书院全体师生集体照。从照片上看，全体师生在学校空地上围绕在一个约又 15 米高的庞大物体前，也许是这高大物体刚刚完成，全体师生一起拍照留念。这个高大物体究竟是什么东西？为了能正确说出这个物体名称，笔者就从网上和图书馆查找有关的资料。经过查找资料得知这个高大物体称为“风力抽水机”，包括风力机组和抽水泵两部分组成，其中的风力机组包括风轮、风轮轴、尾翼、旋转座和塔架组成抽水泵包括泵筒、活塞、活塞连杆及进、出水管和装置在进、出水管内的单流阀组成，其特征是：在风力机组的风轮轴上固定有传动轮，在传动轮设置偏心轴孔，轴孔连接直角弯头后与抽水泵的活塞连杆直接连接。在风车抽水机尾翼上印有英文字母 APPLETON（阿普顿），经查是一家美国公司的名字，有可能是这家公司生产并安装的。我想这风车抽水机方便了学校用水及教学实验。

在这张照片还注意到房屋顶上又有一个装置，经图片放大一看，原来是用于气象的风力方向装置，是由随风转动的箭羽、支柱和方向标志组成的，而方向标志是用中文“东南西北”注明的。有了这个装置就知道每天杭州的风向是吹向哪里，同时也为风车抽水机提供风向依据。



以上介绍的一些科学实验仪器和设备，在当今是乎算过不了什

么，但在 100 多年前杭州是非常先进的。由于，育英书院的校长裘德生本人对数学和物理特别感兴趣，在他的带领和推动下学校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和发展，并且把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先进科学技术和设备带到杭州，如杭州的第一台发电机、杭州城里的第一个蒸汽机、杭州的第一条电报线等等，都是裘德生校长分别从美国带到杭州的学校，填补了杭州在科学技术方面的空白，也促进了杭州现代化的进程。

因此，从 19 世纪 60 年代以后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随着基督教各宗派在杭州的扩大和发展，大批的传教士也来到杭州。随着西方传教士进入杭州，他们一边传教，一边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教育、医学带入杭州。对杭州城市的经济、生活、教育领域作出巨大的贡献。许多领域开创了杭州的先河，也加速了杭州现代化的建设。

## 十一. 《育英书院首任校长裘德生》

在查阅美国传教士王令赓 (Mattox, Elmer Lincoln 1869—1963) 的档案时，发现有关他和裘德生 (J.H.Judson) 的照片和一些稿件。王令赓是 1893 年来杭州，先后在育英义塾和育英书院执教。1914—1916 年出任之江大学校长，1934 年回美国。他与裘德生是从育英书院及后来之江大学是多年的同事，关系非常密切。因此，王令赓存有一些裘德生的照片、资料及合照。



这张照片是裘德生的全家照，照片大约是 1892 年，可能在杭州的家门口拍的。左边坐在藤椅的是裘德生，怀里抱着长女艾琳 (Irene)，大约 5 岁，她手里握着一个洋娃娃，长得非常可爱；右边是裘德生夫人珍妮·菲利 (Jennie filley)，怀里抱着是儿子赫伯特

(Herbert)，大约有7，8个月。

据裘德生写的《回忆录》中，他和妻子是1879年8月28日结婚，同年12月12日来华。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孩艾琳（Irene），于1887年秋天在杭州出生；第二个女孩子爱丽丝（Alice），于1889年八月在上海出生，但四年后她就离开了世界，被安葬在北高峰的山脚附近；第三个孩子是男孩赫伯特（Herbert）于1892年4月17日诞生；最小的一个是女孩子蕾拉·梅（Leila May），于1899年5月1日的黎明出生于杭州。后来长女艾琳（Irene）结婚了，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一个爱他的丈夫和一个聪明的女儿。赫伯特（Herbert）读了外科医学专业，当了医生。蕾拉·梅（Leila）从神学院毕业后，当了护士。大概16年前，裘德生的一位后代（外孙）通过旅游从美国来到杭州，来寻访外祖父和母亲曾出生和生活的地方，他就通过导游来到思澄堂，正巧也是笔者来接待他们，并带领去大塔儿巷育英书院和皮市堂遗址，临走前留下裘德生的《回忆录》的复印件，现藏于思澄堂档案室。



这张照片是1905年拍的，是育英书院全体师生做礼拜的合照。所处的地方应该是学校的礼拜堂。中间站立着并手拿圣经的讲道者就是裘德生校长，台上坐着中西教师和一位弹风琴者，台下学生穿着整洁，还留有小辫，证明是清末时期，他们都端正坐着聆听裘校长的证道。中间挂着一副对联和书法作品，书法作品的内容是根据圣经《马太福音书》5章里的登山宝训中的“八福”。

育英书院是一所教会学校，据学校章程规定，全体师生每日上午八点半要到学校礼拜堂做礼拜，九点开始上课。晚七点自修后，八点仍要参加晚礼拜。每逢礼拜天（主日）要求学生去教会的礼拜堂去听道，以涵养德性，但不强求自愿参加。教会学校的不同年级的学生除了要上汉学、算学、英文、科学、音乐等课程外，还必须有圣道科课程，包括研读圣经、要理问答、新旧约历史、天路历程、圣教史、救世略说等等。裘德生在育英书院里，既是校长，也是传教士及牧师；他既要上物理和数学课，还要用上帝的话去牧养学生。不但让学生拥有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还要有基督教信仰。这也是教会办学校的最初目的。



这张照片是裘德生（一排中间）和王令赓（后排右三）与校友的合照。照片是1923年在上海拍的。此时，裘德生校长已退休离开杭州去了上海，因病留在上海医治。这张照片有可能是王令赓与校友一同去上海探望养病的裘德生校长，临别时一起拍照留念。从照片上看，裘校长一头的银发和雪白的胡须，身体略显虚弱，但眼神炯炯有神。为了照顾他的身体，让他坐椅子靠着拍照。两年后裘校长回美国，再也没有机会来中国了。此照片成为永久的纪念。

下面这张照片是1912年，孙中山（一排右二）和之江学堂师生的合照（局部）。1912年12月10日孙中山满怀对教育的期望，对革命洪流中青年学生的希望，不辞辛苦主动提出前往杭州南面秦望山麓的之



江学堂（育英书院迁此地改名）访问。并与之江学堂师生合影留念照片，孙中山非常感激传教士在他们所创办的学校里所做的工作。裘德生（一排左一）作为前校长及之江学堂自助部的监督（这也是我国最早提倡学生勤工俭学的学校之一）身份，代表校方一起作接待工作，并坐第一排和孙中山合影。可见，他在学校的影响力。

此照片从1912年起，一直悬挂在之江大学“慎思堂”（总课堂）一楼会议室，正对大门最显著位置的墙上，这张照片给之大带来无限光荣和骄傲，也是之大珍贵的“传家宝”，直至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之大解体后才给摘下来。

裘德生于1852年8月11日生于美国密歇根州（Mich）沃特福德镇（Waterford）的一户农家。1876年汉密尔顿大学（Mamilton college）毕业。同年入纽约协和神学院（Union Seminary New York）。三年毕业。1879年12月12日偕妻子一同来华传教。1880年任杭州育英义塾校长，标志育英义塾进入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1897年，育英义塾由初中等程度，渐进为大学，改称育英书院。这是浙江省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裘德生任该院的第一任校长，后育英书院逐渐发达，学生增至百余人，原有校址不敷应用，乃谋久远之计，于1911年春迁至秦望山二龙头，改名为之江学堂，1914年改为之江大学。学校迁入新校址后，裘德生以年事既迈，功成身退，辞去校长一职，专任学生自助部主任。1913年离校，在杭城创办职业学校。1923年，因年事已高，照差会定章，不得不退，离开杭州后，因病留沪两年，于1925年回美国。1930年12月5日，安然去世，享年78岁。1931年4月4日，之江大学举行一次纪念仪式，即为了表彰裘德生为之江大学发展中所作出的贡

献，也为了寄托全校师生的哀思，决定建造一座建筑以示纪念，这个建筑于1932年8月落成，并命名为裘德生科学馆，现为浙江大学之江校区4号楼。

裘德生校长一生在华从事教育41年，桃李遍中国，而其处事勤毅，待人诚恳，慈祥正直，是严师亦是益友。曾和他多年共事的王令庚（E. F. Mattox）传教士对他有这样的评价：“这些年学校的飞速发展主要归于裘德生的勤奋工作。他是第一位把自己的命运长久地与学校紧密相联的传教士，他把所有时间都献给了教育工作。”我想这是对裘德生校长诚恳的评价。也值得我们纪念。

## 十二. 《之江大学之最》

在查阅档案时，发现在王令庚（Mattox, Elmer Lincoln）和万克礼（Kepler Van Evera）两位的档案中有关之江大学的资料和照片是最多的，其原因：一是都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二是都在杭州生活、工作、传教四十多年；三是都参与之江大学的建设和教学工作。因此，收藏了大量不同时期的之江大学的照片和一些中文、英文资料。

之江大学的最前身是1845年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在宁波创办的“崇信义塾”，相当于现在小学程度。1867年迁至杭州名为“育英义塾”，相当于中学和小学程度。1897年改名为育英书院，相当于大学程度。1911年迁入秦望山新校舍，改名为“之江学堂”。1914年改名为“之江大学”。1931年奉命改称“私立之江文理学院”。1940年经民国教育部批准，正式命名为“私立之江大学”，设文理、工、商学院，1952年因中国高校院系调整解散了，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原旧址现为浙江大学之江校区。

之江大学是中国的十三所基督教大学之一（燕京大学、齐鲁大学、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华中大学、金陵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沪江大学、岭南大学），是浙江最早的高等学府，其校园被现誉为“中国最美校园”“杭州最美的大学”。之江大学在许多领域开创了先河，成为杭州、浙江乃至全国之最。笔者就从王令庚和万克礼的档案中的照片中来介绍一下之江大学之最。



这张照片是之江大学的天文台，大约1913年拍的，照片印有英文 PHILADLPHIA OBSERVATORY，翻译中文是“费城观象台”。为什么要称为这个名字，因为这天文台是1912年初，由美国费城特勒夫人（Mrs. Charles P. Turner）及全家捐资建成的。1913年春竣工，取名“费城观象台”。从照片上看，天文台处在在秦望山“二龙头”山巅处在山峦最高处，视野宽阔，有一个天然平台，选择此地，主要是环境好受周围影响较小，是十分理想的天文台气象观察台建造地。天文台外观是用石块砌成，面向南面，台的前方中部有一个凸出半圆部分，上建有水泥圆顶，内应该有圆柱体望远镜基座，上架有活动的高倍、精密的天文观察望远镜。

之江大学的天文台建成后，成为当时浙江省第一座现代天文观察台，杭州最早的天文气象观察台。也是全国最早的一批天文台，同时也成为浙江教育科技发展的显著标志和靓丽名片，1920年前后浙江省地方政府公开发行的货币证券上都印有之江大学天文台的图案。

当时天文台作为学校教学用的设备之一，主要用于天气气象观察和《天文学》的教学和学习，全套设备从美国进口，是当时较先进的天气气象观察和科研、教学设备。可惜在1937年12月日寇占领杭州时，之江大学成为日寇宪兵司令部，学校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天文台也难逃厄运。因天文台在上顶处，树木繁茂，日寇怀疑内藏游击队，故要炸毁了天文台，留下一个约100多平方米、长方形朝南墙体。抗战胜利后，愿计划重新建造新的天文台，只因天体望远镜和一些设备价格昂贵，再加上学校战后要修缮，就放弃了重建计划。

由于时间久远，天文台原来留下的残垣段现已不复存在，湮没在灌木杂草丛中。笔者也曾寻访过天文台的原址，看到只是一些墙址、

水泥半圆柱体残体和碎石。



这是约1919年之江大学里的都克教堂（也称之江堂）的外景照片。都克堂（the Tooker Memorial Chapel）是由新泽西州东奥瑞治（East Orange）都克(Nathaniel Tooker)一家人捐献的。建筑工作是由威尔逊先生（Mr. J. W. Wilson）负责完成的。1917年6月20日，全校师生

及校友、客人300人出席了都克堂的奠基仪式，由杭州的臧牧师（P. K. Tsang）安放基石。1919年1月11日竣工。都克堂外墙由石块砌成，显得庄重和严肃。教堂由主堂和钟楼组成。座落于校园中心附近，作为学校师生平时做礼拜的场所，星期天由专职牧师布道，讲授圣经，合唱赞美诗；这也是虔诚基督徒们聚会、做礼拜、做祈祷以及信徒洗礼的场所，也是庆贺基督教盛大节日圣诞节、复活节和其他基督教庆典的场所。



这是一张都克堂内景的照片。最前方是圣台，台两边各有一个房间。后面有上下两层，堂内排放靠背长椅，整个都克堂可容纳600-800人左右。

在圣台上最引人注目的有一架真管风琴，这是杭州最早有管风琴的教堂，也是杭州教会唯一有管风琴的教堂。那究竟是一架怎样的管风琴？我就请教了杭州青年管风琴师薛强老师，得知照片上的管风琴

是一台很精致的、一排手键盘的、英式风格的小管风琴，音色大概目测在6个音栓左右。因之江堂空间不大，这台小琴正好满足主日礼拜、会众诗歌伴奏的需要。另外，看到管风琴谱架上方有一面镜子，那是用来看诗歌教唱同工起拍手势或者是诗班指挥的指挥图示用的，因为管风琴司琴是背对着台下的。这架管风琴应该在教堂造好之后的一两年内装的（约在1920年）。

1937年抗战爆发，12月日寇侵占杭州，由于之大是美国基督教教会财产，挂看美国星条旗，得到美国牧师的保护，日寇虽然对之大垂涎三尺，还不敢明目张胆大肆抢掠，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之大被日寇完全占领，日寇大肆劫夺，仪器设备、书籍衣物都被抢掠一空。日寇强行赶走美国人，都克堂教堂遭殃，教堂大门被拆除，堂内壁灯、管风琴乐器、教堂大钟等铜铁器被日寇运回国，作为军用物资，橡木长椅也被窃走，凡值钱物品都被掳去。

1945年抗战胜利时，都克堂已是破烂不堪的空架子，教堂内一片狼藉。胜利后不久，立即进行整修，对堂内讲台和二楼地板进行铺设及修补，请木工赶制靠背长椅，被破坏的窗上重新装上彩色玻璃，恢复原来的教堂功能。直到1952年春季，因之江大学已改组为浙江师范学院，由政府直接领导。之江堂信徒大部分是该校教职员及同学，为了实行学校与教会分离的原则，聚会迁到闸口布道所。之江堂被用着教育用房，教堂至今整体保存完好。2016年都克堂修缮后重开，用来作学术报告会、讲座课、开会等用处。笔者也多次去之江校区，都克堂里只进入两次，一次是内部正在修缮，另一次是里面举行画展。但大多时间门都关着的。



这张照片大约是1928年，之江大学附属中学及江浙各中学联合运动会的田径比赛的照片。照片上跑在最前面的两位运动员，从他们运动服上的名字看，最前面印有“秀州”两字，是来自嘉兴秀州中学，是浙江著名的教会学校之一。跑在后的印有英文字母“W”，是来自杭州蕙兰中学，其英文名是Wayland Academy。笔者看过许多蕙兰中学的运动员参赛或比赛的老照片，运动服上都有印“W”字样。蕙兰中学也是浙江著名的教会学校之一，蕙兰中学注重体育。球类、田径尤其盛名，如曾参加三次奥运会（1932、1936、1948）的教练宋君复就出其门。

照片上的跑道是用煤渣和石灰混合土作为的铺装材料，共有四道。前面两位运动员你随我赶跑向最后的终点，从运动员表情来看，最前面是乎有用尽最后力气往前奔跑，争取第一名；后面紧跟的运动员，是乎跑的比较轻松。最后的比赛结果就很难预料了。

之江大学的运动场是1908年戴维·甘博（David Gamble）捐赠的。他是美国宝洁公司（英文名称：Procter & Gamble有潘婷、飘柔、海飞丝等著名品牌）的创世人，同时又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热衷于慈善事业，给北京燕京大学和杭州之江大学等教会大学分别捐赠了大量的善款。这运动场是中国最早按照美国大学校园和奥林匹克的标准建造起来的现代运动场之一。也是浙江最早的现代田径运动场。运动场由一块稻田改建而来的，位于一个伸向河岸的山谷之中，为一个天然圆形运动场。约在1917-1919建成的。

笔者也多次带弟兄姊妹去参观之江大学，看到昔日的运动场，现已经被分割成了两半：南面是球场，背面是网球场。谁曾想到，这块地方竟然是当时中国和浙江最早的现代运动场。



这张照片是1928年之江大学的游泳池照片。之大1911年迁校时有

一简易游泳池后废弃填埋，1927年正式兴建现代化的游泳池。游泳池坐落于体育部办公室南面的山坡下，为一个25X20米游泳池并附有跳板，游泳池西面靠近山边建有小型沉淀池和蓄水池作为泳池的补给系统，北面有一个简单的运动员盥洗室。四周设有供观众观看比赛的水泥凳，这是当时杭州最早、设施最为现代化，并且也是浙江设备最为齐全的游泳池。1928年正式开放。游泳池是由舒鸿（1895年—1964年，字厚信，浙江慈谿人。著名体育教育家、中国首位奥运会裁判，1925年任之江大学体育指导，1948年任思澄堂长老）设计并主持修建。1930年4月，民国第四届全国运动会游泳比赛，就在之江大学游泳池举行，比赛时，蒋介石夫妇及国民政府的一些官员还颇有兴趣的前来观看。现游泳池已被填埋，健身房被拆除，青砖小楼被保留下来，见证了之江体育场地的历史变化。

这些之江大学曾有的历史之最，现在已经完全销声匿迹了，也渐渐被人遗忘了。庆幸的是2006年之江大学旧址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江大学原老建筑将被永久保留下来，继续见证了百年沧海桑田的历史演变。

### 十三. 《1906年杭城地图》

这次在美国查档时，发现除了传教士留下的个人传记、手稿、老照片、报刊、杂志和纪念册等外，还有一些杭州地图、杭州风景旅游地图和浙江地图。下面来介绍一下其中的1906年的杭城地图。

这是一张1906年的杭城内（HANGCHOW）的地图。上面的地名的标注是用杭州方言罗马字及少数的英文字，如“沙河埠”（地图最上方右边）的杭州方言罗马字是sha-ho-han，在杭州的方言中的“河”（拼音he）读成“ho”，还有“贴沙河”杭州方



言罗马字是T'ieh Sha-ho; 又如“岳坟”(拼音是yue fen),但在杭州方言罗马字是Yo-Fen,杭州话中的“岳”是读成“Yo”。又如“西湖”的杭州方言罗马字是HSI HU,英文字是WEST LAK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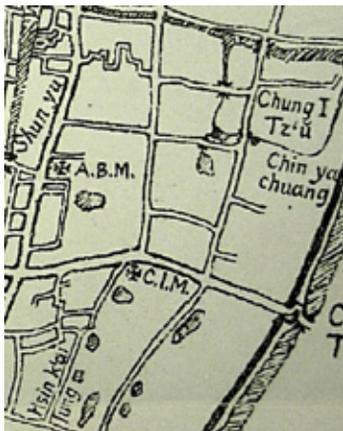
当笔者第一次看到地图上的地名罗马字标注,看得云里雾里,只能看地名的罗马字标注地方和现在杭州所处的地方,猜测一下这个地名应该叫什么,怎么读。笔者是杭州本地人,也试着用杭州话来读读看,是否能正确读出地名。笔者有一份资料是1907由英国传教士慕稼谷(G.E.Moule 1828-1912年)著的《杭州纪略》(Notes on Hangchow Past and Present),在书中看到杭州方言罗马字与汉字对照表,这样可以正确说出地图上的地名。

从地图上的粗线条看,应该是杭州的城墙。杭州城垣自吴越国以来的圈定了城市的发展空间,今日杭州市主城区市中心即大致在古城垣范围内。20世纪初至50年代,杭州城墙基本拆除,目前只留一座城门(凤山)和少量遗迹。从地图上可以清晰看到杭州十大城门罗马字标注,即武林门(Wu-Lin),艮山门(Ken-shan),凤山门(Feng-shan),清泰门(Ch'ing-t'ai),望江门(Wang-Chaing),候潮门(Hou-ch'ao),清波门(Ch'ing-po),涌金门(Yung-chin),钱塘门(Ch'ien-t'ang),庆春门(Ch'ing-ch'un)。

在这张地图上可以看到,一百多年后,杭州有些地名现已不存在,有些地名已改其它名,有些是地名名存实亡,如水星阁(Shih-hsing Ko)现已不存在了,又如贡院(Kung-yuan)现已改为杭州高级中学,再如金衙庄(Chin-ya-Chuang)现已是名存实亡了。

在这张地图上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凡有教堂的地方都标上十字架。我想,也许这个地图是专门为传教士来杭提供方便,能过顺利找到教会;也有可能为来杭探亲的传教士家属去做礼拜提供指南以及慕名来杭的外国人提供旅游方便等等。

从这张地图的局部看到,有二个十字架标志,有一个在十字架的旁边标注英文字母A.B.M.,这个英文字母什么意思,其实是英文的缩写,全称为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y,译成中文为“美国北浸礼会”。这个宗派是



1866年传入杭州。所处的位置在Shun yu 翻成中文名是“淳佑”也就是“淳佑桥”，现在建国南（杭二中）对面。1871年，由美国北浸礼会传教士秦镜（Hurace Jenkins）在淳佑桥东面建造礼拜堂，最初名为“真神堂”，后改为“神佑堂”，1927年改为“民众堂”，最后1985年遗留建筑全部拆除。

另一个十字架的旁边标注英文字母 C.I.M,也是英文缩写，全称为“China Inland Mission”译成中文为“中国内地会”，这个传教差会是英国人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于1865年在英国伦敦创办的，于1866年传入杭州，并在杭州建立传教总部，开始内地会在中国活动。所处的位置在Hsin k' ai Lung，翻成中文名是“新开弄”，现为清泰街附近。1901在清泰街购入土地一块，1902年崇一堂建成。1958年杭州教会联合后，崇一堂及周围的土地成为民宅和铁路材料仓库及铁路医院。2005年易地重建成了崇一堂。

从这张地图的局部最上方看到一个十字架，并用英文字母C.M.S注明。C.M.S是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for Africa and Esat 的缩写，译中文为“安立甘宗”或“英行教会”，是圣公会的英国差会，该宗派是1859年传入杭州。所处的位置是在Ma-so Hsiang，翻成中文为“马所巷”。现为冯山仁巷和马市街（Ma shih chieh）的交叉口。在这里建由教堂和会督住所，教堂建于1871年，名为“信一堂”，1958年教会联合礼拜，停止聚会，后改为马市街小学。不过会督住所的老房子仍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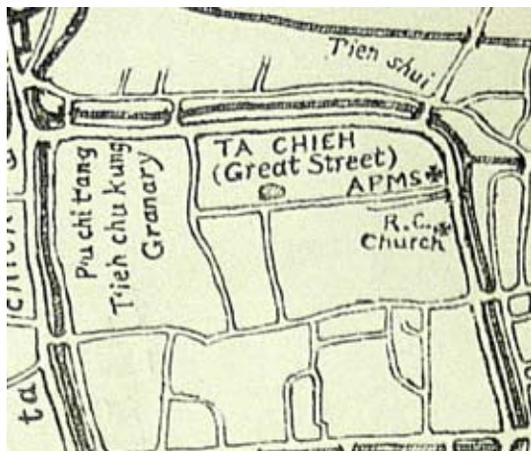


这张地图局部的下方看到的十字架，注明英文字母A.P.M.N，是“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North”的英文缩写，译成中文是“美国北长老会”，该宗派是1859年传入杭州。所处位置是在shang p' i-shin 和 T' a erh Hsiang，译成中文“上皮市”和“塔儿巷”交叉口。现为皮市巷和大塔儿巷交叉口。在这地方建有皮市堂，也就是思澄堂的前身。该宗派是1864年12月租皮市巷五开间楼厅一所作为礼拜堂，

1890年因信徒增加，乃在皮市巷，建造皮市堂，1903年完成迁入新堂礼拜。该堂后归属“杭州中国耶稣教会”使用。现旧址也不复存在了。

在Ma shih chieh（马市街）和Ta fang po(大方伯)交叉口，有英文C.M.S Hospital，译成中文就是“英国圣公会医院”是一所教会医院，中文名为“广济医院”，建于1869年，直到1952年止。现为“浙二医院”。

这个地图上有二个十字架标记。一个用英文字母A.P.M.S标注，是“American Presyterian Mission South”缩写，翻成中文是“美国南长老会”。该宗派是1867年传入杭州。所处的位置在Tien shui，翻成中文就是“天水”也就是“天水桥”。此



宗派1874年在该地建造教堂，最初名为“胡郝礼拜堂”，后重建，因在天水桥附近就称为“天水堂”。1958年杭州教会联合礼拜，停止聚会，房产被占用，直到1984年教会房产归还，开始重新聚会。2009年进行房屋翻新，直到现在。

另一个用英文字母R.C.church标注,是Roman Catholic Church的英文缩写，翻成中文是“罗马天主教会”，就是现在位于中山北路的“天主教堂”，此教堂，建于1659年，原名为“圣母无原罪堂”，有350多年历史。2011年1月，教堂成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

从一百多年前杭城地图，给了我们一个借鉴。杭州是我国著名的风景旅游城市 and 历史文化名城，有很多国内外游客来杭州旅游，其中也有不少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徒），是否能制作类似1906年的杭城地图的旅游地图，并把主城区的教堂，如思澄堂、天水堂、鼓楼堂、崇一堂、城北堂、天主教堂用十字架标注，并标注中英文，方便国内外信徒寻找教会礼拜或游客参观访问。这才是杭州要打造一个国际旅游城市应该有的措施。

#### 十四. 《杭城基督教联合布道委办》

在查阅档案中，发现一本英文册子名为《HANGCHOW AN ORGANIZED CITY OR EAST AND WEST IN “HEAVEN BELOW”》，共26页，这本册子是1920年由杭州联基督教合布道会出版。这册子的内容主要介绍杭州这座城市的基本状况，基督教在杭州的发展及教会学校、医院和青年会简介，并插入一些照片，有些照片我也是第一次看见，特别是杭州有些教堂，因历史原因都不存在了，里面教堂的照片尤为珍贵。下面就陆续介绍这本小册子的内容。



上图片是这本英文册子的封面。右边是书名《《HANGCHOW AN ORGANIZED CITY OR EAST AND WEST IN “HEAVEN BELOW”》，译成中文大意是《杭州，一个有秩序的城市——中西交汇于“人间天堂”》；左边图片是杭州著名的灵隐寺大殿，最上面写着“杭州”的汉字，下面写着时间1920。封面的设计已经体现了中西及杭州的特点，也涵盖了书名的意思。

下图片是杭城基督教联合布道委办部分成员合照，拍摄于1920前。照片上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外国人是在杭州的英美传教士，中国人是杭州各教会的牧者及青年会干事等。杭州基督教联合布道委办成员是来自杭州五大宗派，即英国圣公会、美国北长老会、美国南长老会、中国内地会、美国北浸礼会及青年会的代表，如鲍哲庆（二排左二）作为教会牧师，代表美国北浸礼会；董承光（二排左一）作为干事，代表杭州基督教青年会；费佩德（Robert Ferris



Fitch, 四排右三) 作为该委办的总干事, 代表美国北长老会; 倪良品 (四排右二) 作为教会的牧师, 代表英国圣公会; 葛德基 (Earl H. Cressey, 四排左二) 作为教会学校的校长, 代表美国北浸礼会; 富裕生 (Charles Fairclough 三排右二) 作为传教士, 代表中国内地会; 梅滕更 (David Duncan Mai, 二排左四) 作为教会医院院长, 代表英国圣公会; 周梅阁 (四排右一) 作为教会牧师, 代表美国南长老会; 佛罗伦斯·南丁格尔·史密斯 (Florence Nightingale Smit, 是梅滕更夫人, 一排右三) 及艾达·克洛斯 (Isa Kloss, 费佩德夫人, 一排右二) 作为姊妹, 分别代表英国圣公会和美国北长老会。

杭城基督教联合布道委办成立于1913年。1915, 有美国来的艾迪博士 (Dr. Sherwood) 旅杭展开空前第一次布道大会, 由王正廷翻译, 地点假城站戏院, 此事震动杭城, 而当时政治、社会均在转变之中, 教会方面已深悉不能闭关自守来应付环境变化的, 新的形势下对教会事工发展, 有莫大的机会。1916年有传教士费佩德 (R.F.Fith)、明思德 (R.J.Mcmmullen)、鲍乃德 (E.E.Barnett)、梅滕更 (D.Duncan. Main) 等及中国牧师张宝善、陈达三、鲍哲庆等正式发起组织“杭州联合布道会”。租赁大方伯民屋为办公室, 聘费佩德为总干事, 倪良品为布道干事。当时得各教会中外人士的协助办理事工。这个组织作为杭州市内外各教会交换思想及联合布道的。其事业可分下列:

- (1) 设立中外书局及阅报处。
- (2) 散播劝世文; 按全城分48区。
- (3) 勉励大会的召集; 按会期五日, 各方到会代表约五百人。
- (4) 影灯、演讲;
- (5) 交谈会; 集合五大公会的信徒在协和讲堂, 到

会者千余人。(6)研经团的设立;按全城共十二处,课程采用福斯留客氏祈祷之旨一书。(7)公祷会的举行;开始在星期三举行,后改星期天举行。(8)中西交流会的设立,以本城各教会的领袖为成员。(9)报纸宣传。(10)特别演讲及布道。委办成员各自都有明确的分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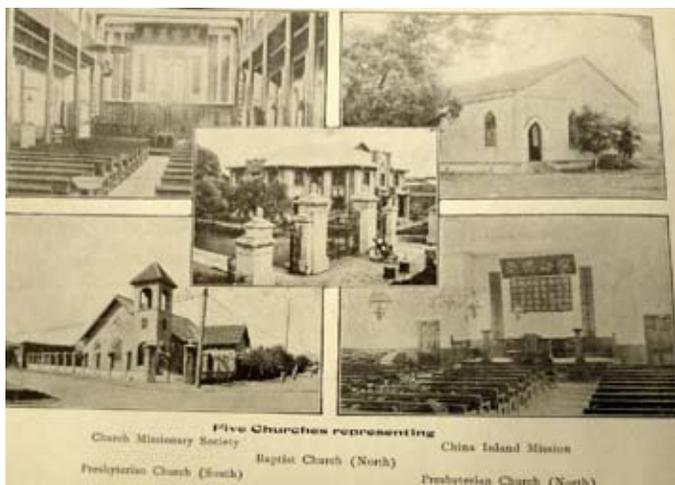
1921年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经济困难,缩小范围,改称为“杭州基督教协会”,仅聘干事一人,办公室也改设在广济医院梅滕更院长赠送的直大方伯房屋内。由倪良品任义务干事。1926年创办了《杭州基督教半月刊》报刊,登载杭州城基督教各团体新闻及同宗派的消息。

在100多年前,为了更好的使福音在杭城广传,联合了杭城五大宗派的主要负责人及教会各类人才,组织了“杭城基督教联合布道委办”,打破了以前各宗派及教会各自为政的局面,共同合作,并通过各种传播形式,为在杭城传播基督的福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这以后的七十多年间,杭州的教会先后成立了“杭州基督教友谊社”“杭州基督教协会”“同工合一祈祷会”“杭州基督教协进会”“杭州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及“杭州市基督教协会”的教会组织机构和团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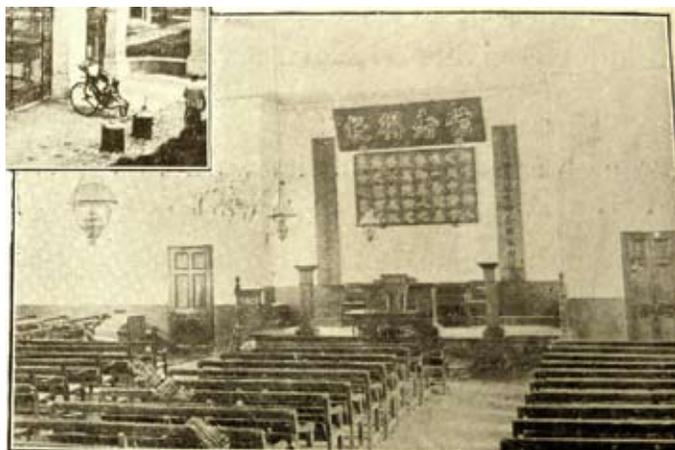
## 十五.《杭城历史上曾有的教堂》

据1956年统计,杭城基督教大小礼拜堂24所。1958年,杭州基督教实行联合礼拜,开放5处教堂(湖山堂、救恩堂、思澄堂、鼓楼堂、南星桥福音堂)。“文革”时教会被关闭。直到1979年9月23日鼓楼堂开放,它是文革后杭州第一个开放的礼拜堂。后陆续有思澄堂、天水堂、城北堂、拱宸堂,笕桥堂和2005年易地复建的崇一堂等。由于种种的历史原因,历史上杭州市区的其他的教堂有的已被拆除,有的已挪作他用。究竟这些教堂是什么样子?由于没有留下历史照片,就不得而知了,只留在人们的记忆里和文字里。

在美国长老会查阅档案中,发现一本1920年的英文册子名为《HANGCHOW AN ORGANIZED CITY OR EAST AND WEST IN “HEAVEN BELOW”》,共26页(在第十四《杭城联合布道委办》已介绍一部分内容),在里面看到杭州五个宗派的主教堂的图片,使我们有幸看到这几个教堂的内外的样子,弥补了一些历史的缺憾。



这张图片是这本《HANGCHOW AN ORGANIZED CITY OR EAST AND WEST IN “HEAVEN BELOW”》的英文册子的插图，在第六页。有五个教堂的内景和外景。图片的下面有英文标注是 Five Churches representing (五个教会的代表)；再下面是杭州五大宗派的英文名字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圣公会)， china Inland Mission(中国内地会)， Presbyterian Church(South)(南长老会)， Baptist Church(North)(北浸礼会)， Presbyterian Church(North) (北长老会)。



这张图片是皮市堂的内景，应该是1920前拍的。礼拜堂内的圣台两边有一副对联，左上联是写着“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舍我末由就

父”；右下联是“尔当尽心尽意尽力爱主尔之上帝”；最上面的匾额是横批“信者得救”。上下联的句子分别出自《圣经》约翰福音14章6节和路加福音10章27节。在匾额的下面还有一块字，上面写着“神唯一神人之间中保亦唯一耶稣基督即其人也成为挽回之祭不第为我侪之罪亦为举世之最也”，这句话也是分别出自《圣经》提摩太前书2章5节和约翰一书2章2节。其实图片上字是模糊不清的，笔者又是怎么知道的呢？笔者曾看到有一张1956年思澄堂老照片，在思澄堂圣台上就有一副对联和中间一块字，和这个图片是一样的，这才正确说出上面的字。

皮市堂圣台上左右各有两把中式椅子，主要是主持人和讲员坐的，中间是讲台。下面一排典型的教会长椅；最右边侧面几排长椅和钢琴（或风琴），应该是诗班坐的位置。整个教堂的布置很中国化、信仰化和宗派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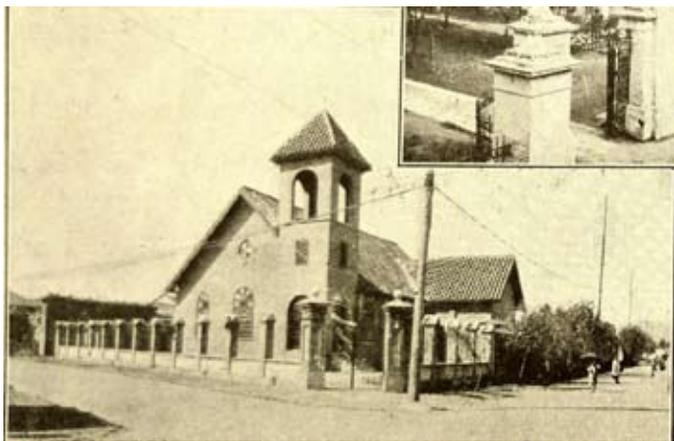
皮市堂是杭州最早的教堂之一，也是思澄堂的前身。皮市堂的历史在之三《思澄堂轶事—张澄斋牧师》中介绍过，并看到有一张皮市堂钟楼的图片，这样笔者手头上就有了皮市堂内景和外景照片，填补了空白。最后皮市堂于1927年归属于杭州“中国耶稣教会”使用（有关“中国耶稣教会”的历史发展在之六《杭州第一处自立教会——“中国耶稣教会”》中介绍过）。



这张图片是民众堂的外景，1920前拍摄的。民众堂原地址在建国中路90号，在教会办的惠兰中学旁（现杭二中）。图片上铁制的大

门就是蕙兰中学大门口。教堂外观呈现十字型，建筑具有浸礼会教堂风格。民众堂的大厅呈长方形，可供150-200人聚会。

教堂初名真神堂，后又改为神佑堂，是属美国北浸礼会。1871年，美国秦境牧师由绍兴来杭州，购淳佑桥地方，建礼拜堂一座，1898年传教士甘惠德来杭后，教会发展蒸蒸日上，那时有教堂一所，分堂7所，男女中学各一所，小学4所。1915年，因教会教务发展很快，原有教堂不够用，于是发起重建新堂，新堂于1916年建成。图片上教堂就是1916年建成的新堂。1927年，杭州教会因受当时教会独立运动的影响，神佑堂领袖有数人也参加此运动，大部分信徒和皮市堂及湖山堂信徒组成了“中国耶稣教会”，留下的信徒重新组建，并更名为“民众堂”。1958年教会合一，停止聚会活动。房产被杭二中使用。“文革”时一度自立为木工厂，“文革”后仍为杭二中接管，民众堂遗留建筑在1985年拆除。



这张图片是湖山堂，也是1920前拍的。教堂原位置在原法院路1号（今庆春路和浣沙路交叉口），湖山堂是一幢典型的欧式建筑，走上高高的台阶，教堂前有一座尖顶钟楼，尖尖的大屋顶用铁皮铺设，看上去显得整齐端庄，教堂旁有牧师的住宅和庭院。

湖山堂教堂是属于美国南长老会，英文名为（Stuart Memorial Church），即纪念司徒尔（司徒雷的父亲）教堂，司徒尔牧师在杭传道46年，与西人及华人，均有极好感情，故昔与同来杭传教士贝恩德，首出洋四千元，想在杭州为建设纪念堂，随后有在杭州西友及华友等，均慷慨解囊。由美国明思德牧师负责，在新市场钱塘路，建筑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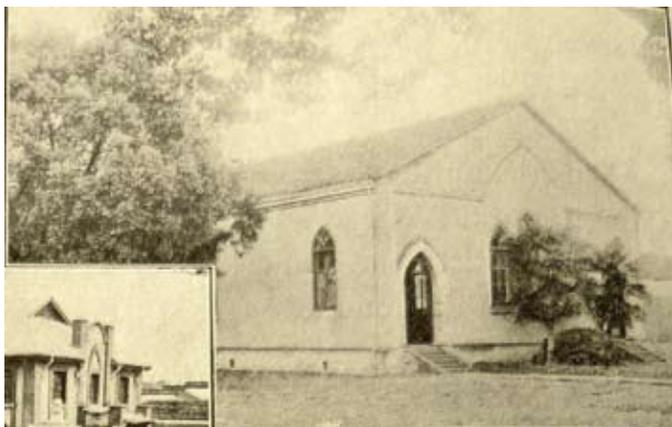
礼拜堂一所，可容把八百余人，需洋一万五千余元，在1915年开始建造至1917年1月告成。建成后，湖山堂不但是杭州基督教活动中心，也是各地教务活动重要场所，在信徒中有较大影响。1958年杭州基督教会实行联合礼拜，湖山堂成为5处开放的教堂之一。“文化大革命”中宗教活动停止，湖山堂被移作他用，1977年下半年被拆除。



这张图片是信一堂内景，于1920前拍摄的。从这张图片可以看到信一堂内景的布置，在中间的走廊看到显圆形的是洗礼盆，寓意让主洁淨自己，预备心灵敬拜。在圣台上左边高台是讲台，右边是主领台，中间是祭坛。圣台最上方有一块匾额上面写着“万有真原”，据说这四个字，是康熙御赐的。左右两边的对联的字比较模糊看不清，根据康熙御赐的匾额和对联，应该上联是“无始无终先作形声真主宰”，而下联是“宜仁宜义聿照拯济大权衡”。最下面也有一些字，但看不清，不知写了哪些内容。教堂内上下有许多西式尖拱型门窗，显得宽敞、高大和明亮。整个教堂布置即具有圣公会特色，也有中国特色，可以说是中西合璧建筑。

信一堂建于1871年，也是杭州最早教堂之一。原地址是在萧仪巷一号（今冯山人巷和马市街交叉处），当时由英国圣公会创办，也是圣公会主教堂，1898年由中华圣公会主持教堂事务。1958年教会合一，停止聚会，后改为马市街小学。现教堂建筑已荡然无存。

下图是1920年前崇一堂的外景。崇一堂原位于杭州清泰街77号，是属中国内地会，1901年在清泰街购入土地一块，1902年崇一堂建成。原崇一堂及周围的土地有20.24亩，是杭州占地面积最大的教



堂。从图片来看，原崇一堂的建筑比较简易，没有华丽装饰，周围环境郁郁葱葱。

1958年杭州教会联合后，崇一堂及周围的土地为民宅和铁路材料仓库及铁路医院。现已不复存在。由于，信徒人数不断的增加，2001年12月21日，由市计划委员会批复立项，同意易地复建杭州基督教崇一堂。新建的崇一堂位于新塘路30号，于2005年建成。



这是1920年敬一堂外景图片，是出现在这本英文册子第14页的插图，英文的内容主要介绍中国内地会在杭州创办的圣经学校基本情况，包括教堂、教室、宿舍、老师住处及办学目的等等。敬一堂是内地会学道院的礼拜堂。原学道院位于西大街内，1911年中国内地会在

杭州创办圣经学校，后学道院是1917年建成。敬一堂成立于1922年。敬一堂和崇一堂是几乎是姐妹教堂，外观几乎差不多，连在教堂后面建筑是学校的图书馆。敬一堂在1958年杭州教会合一后，停止聚会，后改建为小学，1984年敬一堂遗留建筑拆除。现遗址为安吉路实验小学。

从以上这几张教堂图片，看到杭州教堂的建筑的风格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不是一味着追求高大上，而是因地制宜和精致的设计教堂建筑，并融入了中国文化、信仰及宗派元素，这些教堂即使到现在也是百看不厌的。这一切都是可以为今后建造教堂等方面提供宝贵的借鉴。

## 十六. 《杭州教会女子学校》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却没有女子学校。妇女是禁止跨入学校大门的，只能被关在闺门之中接受家庭教育。妇女教育的全部目的就是培养贤妻良母，教育的内容是灌输“三从四德”。中国这种拒女子于学校教育之外的教育制度，自先秦一直延续到清末。鸦片战争爆发后，是以西方教会在我国开办的女塾为开端的。在基督教教义中男女是平等的，获得相同的教育机会是男女平等的体现。为了使我国妇女获得学校教育的机会，传教士于19世纪20年代开始办小学程度的华人女塾，中国本土最早的女子学校建立在1844年的宁波。随着我国近代社会的变革，外国教会又相继在我国开办了女子教会中学和大学。教会大学是我国女子接受现代高等教育的发祥地，教会大学为近代中国培养了第一批接收过高等教育的女知识分子。

在美国长老会查阅档案中，看到一本1920年的英文册子名为《HANGCHOW AN ORGANIZED CITY OR EAST AND WEST IN “HEAVEN BELOW”》中，第21-23页，简单介绍杭州两所教会女子学校历史，即“弘道女中”和“冯氏女中”。

下面图片是杭州弘道女子中学的校舍，拍于1920年前。此校舍原位于杭州新市场（今学士路）。校舍建筑具有欧美风格，前有大草坪，整个环境非常优美。

弘道女子中学是由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1867创办在杭州天水桥的贞才女校、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1899创办在杭州大塔儿巷的育才



女校、美国基督教北浸礼会1902年创办在杭州珍珠巷的惠兰女校。1912年（民国元年）这三校合并，正式定名为“弘道女校”英文名为“Hangchow Union Girls School”。“弘道”语出《论语》：“人能弘道”，这里大概有借中国的孔孟之道，以引伸为耶稣之道在中国扩而大之。

1914年，在新市场建新校舍。1916年迁入。1935年校舍基本完成。1924年改设初高中的完全中学学，添设了幼稚师范、普通师范各一班，并增设附属小学部和幼稚部。1928年正式更名为“杭州市私立弘道女子中学”，小学和幼稚园仍附属于中学部。

抗战期间，弘道女中先迁建德，继又去沪，与华东区基督教15所学校合并成为“华东联合中学”，后又到绍兴借越光中学（教会学校）校舍，和嘉兴秀州中学、杭州惠兰中学等校合办联合中学。1938年绍兴沦陷，弘道女中被迫停办。1945年（民国34年）8月抗战胜利，弘道女中回杭复校。1952年停办，高中部并入惠兴女中，初中部并入杭女中。小学部仍保留，名为学士路小学。校舍暂行借拨杭州第二卫生学校应用。1953年11月，校舍又移作“浙江省立妇幼保健院妇产科部”。从1983年，妇女保健院不断发展，旧屋已不够应用，陆续拆除重建和扩建，原小学部也就全部拆除改造，部分成为“行知幼儿园”。1999年，医院更名为“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至今。

弘道女中的校训是“朴、勤、爱、诚”。弘道女中是个教会女校，除文化课外还有着她独特的特点：首先是宗教气氛浓厚。宗教课是课程设施最为主要的一部分。读经讲道，早祷晚祷，唱诗祷告等

等。

弘道女中教学有几个特点：一是高中英语课教师全用英语讲课、对话。英语教学质量多年列于杭州市中学前茅。二是 设家政课，传授家庭日常烹调、饮食和服装裁剪、礼仪等等，为学生毕业后理家、交际、做合格主妇创造条件。三是设有钢琴选修课，培养了不少音乐人才。



这张图片是 冯氏女中校舍，摄于1920前，原校舍在紫金观巷。从图片上看，校舍有二层，别墅式的，前有花园，环境优美。

冯氏女中的创办人是英国圣公会女传教士玛丽亚·沃恩(Mary Vaughan)捐资所建。1907年，玛丽亚·沃恩女士归国度假，建筑工程由她委托广济医院的梅滕更医师主持进行。1908年玛丽亚·沃恩返回杭州，因旅途辛劳引发宿疾，在杭去世，葬于西湖九里松外国坟山。为了纪念她，定校名为“冯氏高等女学堂(Mary Vaughan Girls, High School)”。学校于1909年2月13日正式开学，首任校长为沃恩的挚友巴恩斯(Barnes)女士，学生仅有20人，开创了杭州女学风气之先锋。1914年学校改为“冯氏女子中学”。1932年12月奉浙江教育厅核准立案，改名为“杭州市私立冯氏女子初级中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该校停办。1946年9月，在原址复校。1951年6月6日，冯氏女中曾改名为“杭州市私立东辉女子初级中学”。后并入杭州第十中学。

杭州这两所教会女子学校，培养了我国著名的女教育家、女科学家、女作家、女音乐家等等。如曾宝荪(1893-1978)，她是清朝重臣曾国藩长曾孙女。1909年曾宝荪入读冯氏女中读书。1911年圣诞节

在杭州圣公会受洗入教。1912年，冯氏女中校长巴恩斯带曾宝荪到英国留学深造，成为中国第一个赴英留学的女子。并于1916年获伦敦大学理科学士学位。1918年，曾宝荪在长沙创办艺芳女校，前后长达30余年，成绩斐然，成为一名女教育家；又如吴贻芳（1893年—1985年），是中国女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基督徒。1913年，进入杭州弘道女中就读四年级。1916年，经弘道女中教师诺玛丽介绍，进入金陵女子大学就读，1919年毕业。1928年受聘于母校金陵女子大学，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第一位大学女校长，先后主校23年。1945年，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成为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第一位女性。1979年获美国密执安大学为世界杰出女性专设的“智慧女神”奖；再如著名女作家琦君（潘希珍1917—2006），是1930年入弘道求学，并曾再弘道任过教。19149年赴台湾。后定居美国。她著名的小说《橘子红了》于2002年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再如刘庄是我国著名作曲家。她是1950年弘道高中毕业。1957年在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后历任上海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师。曾参加创作钢琴协奏曲“黄河”及交响诗《梅花三弄》等作品。

弘道女中和冯氏女中这两所杭州教会女子学校虽然已经不存在了，但为中国女子教育作出很大贡献，并在中国女子教育的历史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

## 十七. 《早期来杭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

宁波是浙江福音传播最早的地区。1842年，签订了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岸，洋人可在五口岸自由进出及居留，领事裁判权。1844年2月《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浦条约》。允许外国人在五口议界址内兴建房屋、学校、医院、教堂。因着这些条约，英美各差会纷纷派传教士来宁波传教。

最早来宁波建立教会是应属美北浸礼会，传教士玛高温（D. J. MacGowan）于1843年10月11日来到舟山，于11月11日到达宁波，并开办诊所、建立教会。1844年6月，美国长老会麦嘉缔（D. B. McCartee）到达宁波，在佑圣观内施医传教。1848年5月，英行教会（又称“圣公会”，下同）传教士从1848年由英国传教士禄赐（Russell）与戈柏（Cobald）来宁波传道开始。英国著名传教士戴

德生 (J.H.Taylor) 于1853年受中华传道会 (又名醒华会) 的差派, 于1854年抵达上海。1854—1856年期间, 戴氏数次进入浙江传教。后于1856年8月开始在宁波传教, 在柳汀街施医传教。

1858年, 在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后, 中国与英、法、美、俄四国签订《天津条约》。中国全面开放她的国土, 容让洋人在各地游历。这样即表示一切传教的藩篱皆被撤去, 整个国家皆可容许传教士自由传教了。于是在宁波的传教士藉着这样机会就纷纷向浙江各地去传教。

杭州市浙江省的首府, 经济富庶、人口众多。对福音的传播有一定的影响力。于是在宁波各差会都派传教士来杭州拓荒布道, 把传福音带到杭州。对今后杭州的教育、经济、文化、科学、生活等都有一定影响。

在这次美国长老会档案馆查档时, 发现了几张早期来杭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的照片。我在写《杭州基督教史》时, 一直找不到, 这次终于在美国找到了, 弥补了缺憾。因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时, 因地域差异, 长老会分裂出北长老会和南长老会。原长老会也称北长老会。下面就介绍这几位早期来杭的美国南北长老会传教士。

1859年2月美国北长老会派倪维思 (右图) 夫妇从宁波前往杭州。最初住在钱塘江畔、六和塔下的一座寺庙中, 不久之后又在城中紫阳山上的一座道观租房屋。1859年6月, 倪维思夫妇回到宁波, 向宁波差会的传教士介绍了在杭州的情况, 并要求移居该地, 开辟站点。传教士们都对在杭州建站充满期望, 认为有必要在杭州建立传教站。在宁波待了一、二周后, 倪维思又回到杭州, 雇工匠修整房屋。而宁波差会派到杭州的两位本地助手也在城中一姓魏人家租住。倪维思夫妇本打算在此长期在此居住, 开始建站传教工作。



然而, 中外关系的阴晴不定迅速击碎了长老会传教士们的乐观憧憬。1859年6月, 因《天津条约》的换约问题, 清廷与英、法等西欧列强的关系再度剑拔弩张。英法联军进攻大沽口炮台之后, 杭州地方官员对倪维思等外国传教士的态度, 陡然改变。浙江巡抚通过宁绍道台, 照会美国驻宁波领事, 要求把传教士召回宁波, 其中特别提到倪维思, 虽经地方官员反复劝说, 仍不肯离开。迫于压力,

倪维思夫妇于1859年9月返回宁波。由倪维思开辟杭州传教站的计划，到此也就无疾而终了。后来，倪维思一家于1861年与他人结伴，前往烟台，开始了其在山东成功的传教士生涯，直到1893年在烟台去世。



左边照片是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葛宁（也翻译葛琏David.D.Green），他是第二批来杭州的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之一，也成为了美国北长老会杭州传教站的真正奠基人之一。

1864年，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接近尾声。浙江战场上，太军已成强弩之末。1864年1月，葛宁来到当时还为太平军所占的杭州，并在城乡一带一月有余。3月20日，天平军李秀成率部退出杭州。传教机会来了，于是在11月，他与华人张澄斋由宁波来杭暂住马所巷圣公会会内，12月租皮市巷五开间楼厅一所作为礼拜堂，并向宁波差会致信传道部，说明杭州因遭受战乱、地价低廉，可以不费周折地购置到房屋。葛宁希望能够得到传道部的批准和资金支持，尽快在杭州建站。1865年2月，传道部回信予以支持。1866年元月宁波长老会派教师陶锡祈(Samuel Dodd)、葛宁及谢行栋来杭成立支会，1866年1月，葛宁一家迁至杭州正式重建杭州传教站。在9月25日由宁波长老会封张澄斋为教师主理杭州支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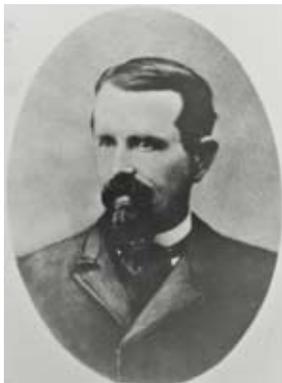
经过葛宁和传教站的同工们有条不紊在杭州传教，终于在1866年，杭州传教站就有了13名领圣餐者。

1866年岁末，葛宁向差会报告说“2名皈依者接受了洗礼”，身处杭州一线的他还提议将宁波差会的总部搬到杭州。1867年6月19日，宁波差会召开会议，会上达成协议，将传教士平均分配到杭州和宁波，随后决定将崇信义塾迁往杭州（就是后来发展成为之江大学）。标志着杭州传教站作为一个能传教能培养教牧人员的大型传教站已经建立起来了，葛宁功不可没。葛宁于1872年年去世。

右边照片是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应理理



(Inslee Elias B1822-1871)牧师。杭州是美南长老会的发祥地，而应思理牧师是最初传教士。他原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1857年抵宁波，并与1861年返美，与该会脱离关系，1865年加入伦敦会，驻于松江，1866年移驻上海附近工作约4个月，经伦敦返美。1867年他奉美南长老会差派来杭州开创第一总站，先在羊市街紫金桥租屋设堂，并设男女学校，后迁至大井巷环翠楼附近租赁民房，并就近购买管米山地方建筑洋房。三年后回国。



胡思敦



郝理美

这两张照片是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胡（吴）思敦(Hale Houston)和郝理美(Benjamin Helm)，他们是第一批来杭的传教士之一。1868年胡（吴）思敦和郝理美等传教士受派来杭州传教。

南长老会组织的布道团，最初落脚在杭州市内的城隍山的管米山，并建立了一个据点。山坡上是一排排庙宇和政府官员的住宅，布道团驻地可以说是居高临下，恰巧正对着当时政府某官员的住宅，1871年当这位官员的儿子患病，医生和占卜家们，就把病因归咎于一股邪气，说是外国人住在山上造成的。于是地方当局千方百计编造理由，要求南长老会布道团搬迁，当时政府官员也主动配合，有芦藩台批准，拨给天水桥畔（现耶稣堂弄）荒地10余亩。作为南长老会布道团活动场地。

当时，清政府时局动乱，太平天国军队打杭州，扎营城外的耶稣堂弄一带，民房均被烧毁，农田早已荒芜。虽芦藩台批了地块，但传教士住宿仍无着落，住房还需要另租民房解决。直到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差会拨来经费，先在这块基上建房二间，虽比较简

陋，但还是开放了布道所，落成之日，芦藩台还特地赠送了“胡郝礼拜堂”（胡思敦和郝理美简称）木匾一块以示祝贺，“胡郝礼拜堂”实是杭州最早的基督教礼拜堂之一，也就是基督教天水堂的前身。1875年胡、郝两位传教士任期已满回美国了。



这张照片是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司徒尔（John Linton Stuart 1840-1913）和他夫人玛丽·霍顿（Mary Louise Horton 1841-1925）的合照。司徒尔是第一批南长老会来杭的传教士之一，也是在杭州传教时间最长的。1867年，美国南长老会派第一批传教士司徒尔等人来杭州传教。司徒尔为了能在中国传道，必须学会中国的语言，而学习这种语言的最好方法是同中国人一起生活。于是，司徒尔在一座鸦片烟馆的楼上租了住所，并雇佣了一个未经训练的中国厨师照料生活。后来，经过五年持续不断的劳累、奔波和生活的煎熬，导致他的健康出了问题。南长老会决定将他送回美国修养。在回国的日子里，他恢复了健康，又认识了女友玛丽·霍顿小姐。很快，玛丽小姐就成了他的新娘，成了司徒尔夫人。

1874年夏天，司徒尔和玛丽·霍顿结婚，蜜月刚过完，他们夫妇便一起来到中国的杭州传教。司徒夫妇与其他传教士一道，住在杭州城武林门内美国南长老会出资建造的一片住宅里，此地杭州居民集居区，紧靠农村，牧师们以住地周围的贫穷百姓和附近村里的农民为传教对象。1875年司徒尔主持天水堂工作。差会又增拨建房经费，不久就在耶稣堂弄二号，即“胡郝礼拜堂”原址上，拆去简易平房，重新建造礼拜堂，并正式命名为基督教天水堂，有在礼拜堂后面新建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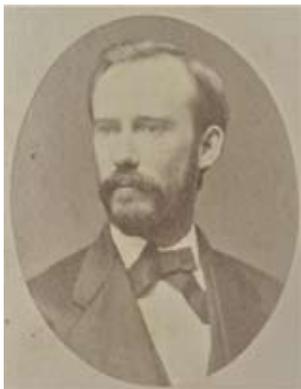
教士住宅楼二幢，男女书房及宿舍5-6幢等一大片建筑群，建筑用地相继增拨到80余亩。在适应新生活不久，对办学抱有浓厚兴趣的司徒夫妇便先后开始筹建新的学校。约翰·林顿·司徒开办了一所男子学校，玛丽·霍顿创办中国第二所女子学校，并亲自担任校长的职务，后来这所学校被并入杭州有名的宏道女中。1890年玛丽·霍顿组织了我国第一个学校女青年会。司徒夫妇除了偶尔回美国休假外，他们一直默默无闻，但却意志坚定献身于传教事业。久而久之，人们就称这条小巷为“耶稣堂弄”沿用到现在。

1913年，司徒尔先生因病去世葬于杭州九里松外国人墓地。为了纪念司徒尔在杭州生活和传教45年之久，并与西人及华人，均有极好感情，故昔与同来杭传教士贝恩德，首出洋四千元，想在杭州为建设纪念堂，随后有在杭州西友及华友等，均慷慨解囊。由美国明思德牧师负责，在新市场钱塘路，建筑大礼拜堂一所，可容把八百余人，需洋一万五千余元，在1915年开始建，于1917年1月告成。教堂建成后，大家一致同意以“思尔堂”为教堂名，但司徒雷登（司徒尔大儿子）认为他父亲生前不喜欢扬名，我也有之意，请另取一名。于是共商，钱塘路临近西湖，西湖三面都是山，有湖有山，就取名为“湖山堂”。

司徒尔去世后，妻子玛丽·霍顿就搬去北京与大儿子司徒雷登同住，直到1925年84岁时，在北京去世。她在中国居住50年，她去世后，她的遗体送回杭州安葬在杭州九里松司徒尔墓旁。司徒尔有四个孩子，其中大儿子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在中国现代史上影响深远的人物，他出生在杭州，曾担任燕京大学校长和驻华大使，最后葬在杭州。第三儿子司徒华林（Warren Horton Stuart），曾任之江大学校长。还有二儿子和四儿子也葬于杭州。司徒尔一家与杭州有着不解之缘。

右边照片是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贝恩德（George Whitfield Painter, 1839-1933），他是早期美南长老会来华的传教士之一。1873年10月，他以传教士的身份被派到中国杭州从事传教，并协助管理男子学校。

贝恩德传教方式与众不同、颇为特别。他喜欢外出传播圣经福音知识，而不是组织信徒和固定在教堂内牧养珍惜此



物；他并不免费派发书籍资料，而是以微价宣售其福音传单和小册子，以便让受众更为珍惜此物。他经常以河船为家，吃住在船，金岸传教，在浙北、苏南德京杭运河沿岸一带巡回传福音，与沿岸德传教站互相支援与配合，传教成效显著，

1879年，他被任命为美国驻华馆的牧师。1904年，由于身体健康原因，在中国工作生活了30年后，贝恩得回美国养病。回到美国后，贝恩德为纪念其友司徒尔，曾率先捐款四千元，想在杭州建造礼拜堂，经过国内外人士的多方捐款和努力，于1917年建成，就是后来的湖山堂。贝恩德于1933年3月7日在美国去世，享年94岁，遗体被安葬长老会的一个墓地。

每谈及基督教入华，至今仍有些国人，称基督教为“洋教”“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麻痹中国人民的鸦片”，而传教士（主要是来自英美国家的）在人们的印象中总是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帮凶和文化侵略者的形象。近四十年以来，随着时代的进步及深入研究，发现我们以前对传教士的认识只是片面的，只是少数传教士参与过近代鸦片战争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和翻译以及为侵略者提供当地的情报。

但我们相信绝大多数的传教士，他们热爱中国，传扬福音，乐于奉献，甚至把生命都留在了中国。除了有传教士的身份外，有些传教士还是科学家、艺术家、医学家、教育家等等，他们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带到中国，在中西方文化交流方面作出过贡献。传教士向中国传播西方文化，对中国封建的解体并逐渐演变为一个半封建社会起过一定的催化作用，他们给中国封建社会注入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价值观、伦理观和生活方式，客观上对中国近代化起了促进作用。

## 十八. 《沦陷时期的杭州基督教会》

在之三和之四中的文章中，提到过在这次美国查档中，有关杭州教会资料最多是一位曾在杭州传教四十多年的美国传教士万克礼（Kepler Van Evera）的档案里。他在杭州沦陷时期，一直在杭州并参与战时服务救助工作，解救和保护大量的难民。这次在查阅他的档案时，发现了许多杭州沦陷时珍贵历史照片和资料。很多资料都是第一次看见，也填补杭州教会在沦陷时期各方面的资料。

下面这张照片是沦陷时，杭州宗教团体负责人筹组的“国际救济会”及“红十字会委员会”的部分成员合影照。在这张照片上的中



外基督教界人士有：狄尔耐(Eugene A.Turanr ,一排左一，杭州基督教青年会干事)、高斯德(John Curtis一排左二，浙江圣公会会督)、明斯德(R.J.McMullen 一排左三，城北堂牧师，曾担任之江大学校长)、葛烈腾(E.H.Clayton 一排右一，红十字会成员，曾担任杭州教会学校蕙兰中学校长)、万克礼(二排左二，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红十字会司库)、苏达立(Stephen D.Sturton 二排左三，杭州教会医院广济医院院长，红十字会成员)、田浩征(二排左五，杭州教会医院广济医院总干事，红十字会成员)、邬式唐(二排右一，杭州基督教青年会干事)、赵克文(二排右二，杭州基督教青年会干事)



以上两张照片是杭州沦陷时期，杭州某教会办的“苦儿班”分发午餐的情景的照片。从最左面照片看，这些孩子们一字排开坐在一起，衣衫褴褛，一看便知是贫苦的孩子，有的脚上穿着布鞋、草鞋，甚至有些孩子都光着脚。这些孩子大都在十几岁年龄，看上去都是男孩子。他们都在等待午餐的开始。右面照片是孩子们在“苦儿班”帮

忙分发午餐的情景。这些孩子看上去年龄稍大些，有男孩和女孩，有二个女孩子面对拍照害羞的低着头。有一个大木桶估计里面是饭，桌上有二个铁桶放的应该是菜，孩子们脸上面带微笑，准备分发菜饭。

这张图片是杭州沦陷时期的日本发的管制地区的通行证。上面的文字是日文的汉字，此证由日本军特务部颁发的，盖的的印章是烟部队特务部，责任人是 大岛君；通行时间期限是十三年六月十四日至六月二十三日，这里的十三年是用日本



昭和年，也就是公元1938年；在注意这一项中，用的是日文片假名，笔者是不懂日文，就请教我堂懂日文的朱国红姊妹翻译，应该是“当认为由危险或其他不利事项时，现场也有可能阻止其通行”的意思。在右边有两张照片是在杭州的传教士万克礼（下一期专门介绍）夫妇。上面国籍是“米”，“米”子在日文是“美国”的意思。住所是杭州南星桥，万克礼夫妇长期住在南星桥一带的雄镇楼车驾桥五福弄。我想，万克礼夫妇办此证目的，是为了能方便杭州教会战时服务救助工作的需要。



这张照片是杭州民众堂苦儿教养所全体孩童和教会人士的合影，是1939年9月在蕙兰中学里拍的。杭州民众堂（之十五中介绍过）的苦儿所是1939年5月1日创办，收容440位贫苦儿童，每日免费供给午

饭一餐，同时加以宗教教育以陶冶儿童身心，直到1941年为止。



这张照片是1937年12月，杭州基督教青年会收容所工作人员合影。从左起他们分别是朱孔阳、邬式唐、田浩来、狄尔耐、赵克文。杭州沦陷时，青年会即举办救济难民工作，成立难民收容所，会务由副总干事朱孔阳负责救济工作至1938年5月初结束。收容所不仅提供难民宿处，缺衣少被者还发给衣被，每日免费供餐两顿，又组织难民相互照料帮助；设立临时学校，由难民中学生和较有文化者担任教师；还有医护人员巡回医疗。朱孔阳还和教会人士邬式唐等人亲自奔波、连系铁路、公路、航运各交通部门、设法挤出交通工具，分批转运难民去内地和大后方。当时收容和遣送转移难民有两千多人。



这张照片是1938年9月6日，杭州难民恭送狄尔耐（三排中间者）

的临别纪念合照。拍摄地点是位于车驾桥五福弄里美国北长老会住宅前花园里。狄而耐是杭州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在杭州沦陷时，他也做了大量救济难民的工作。美国北长老住宅也收留的大量的难民。在照片里有思澄堂范光荣牧师和师母（第三排右四、五）也在恭送人员中。

1937年12月24日上午八时，杭州沦陷，日军伤亡先头部队滕井部队占领杭州，日军下令“放假三天”，于是杭州城陷入日军抢掠的暴行之中，恐怖的气氛笼罩着这个“人间天堂”，各地难民来杭，充塞市内，携儿带女，生活无著。在国难当头时，杭州基督教界也积极开展战时服务救助工作。

为了开展战时服务工作，在杭的英国传教士苏达立邀集了杭州宗教团体负责人开会，决定筹组“国际救济会”及“红十字会委员会”。参加会议的有基督教方面的苏达立、高斯德、明思德、万克礼、葛烈腾，天主教的梅占魁，邮电局局长柯登，亚细亚煤油公司经理华莱士，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朱孔阳，玛瑙寺当家本性，道教玉皇善负责人李理，杭州市商会谢虎丞、王五权等二十六人，推举明思德为会长，苏达立为书记，万克礼为司库。会上并决定几项措施：一、在青年会，各教堂、玛瑙寺等处设立难民所；二、利用圣公会的广济医院和邻近的树范中学校舍，收容国民党伤病员兵；三，以国际救济会的名义，通过各教会团体调查登记，对生活困难户发放一部分美国面粉及棉衣；四，利用各教堂余屋，举办供应一顿午餐的苦儿班，救济难童。所需要费用由红十字会及地方团体和商店等捐助。

当时杭州城内属基督教的难民所有：杭州基督教青年会、蕙兰中学、弘道女中、新报社、天水堂、皮市堂、思澄堂、正则中学、广济医院。

据思澄堂教会的范海兰（之四中介绍过）老信徒回忆：“当时思澄堂附近住的都是一些拉黄包车、做苦力的居民。没能力出逃，日军占领杭州后，这些人就成为日军施暴的对象。基于这样的局势，范海兰的父亲范光荣牧师和鼓楼堂的美国牧师万克礼，就在思澄堂设立了一个临时性难民收容所，挂上了国际红十字会旗和美国国旗，附近那些惊恐和无助的难民，因为逃避那寻找“花姑娘”的日本兵，常常连夜翻墙逃入这个“避难所”。最多一次曾收容了三百多名难民，已经楼上楼下都住满了，晚上打地铺，白天怕日本兵看见也都在教堂里，都是附近的妇女和儿童，有的已经被日本兵强暴过，真当可怜。每到

晚上时候，这些难民的丈夫或家人都会悄悄从门缝里递进食物和被服……。”

当杭州沦陷时，美国浸礼会传教士葛烈滕（第一张照片一排右一），借弘道女中和蕙兰中学校舍，主办杭州战时妇女收容所。当时日军进占杭州时，城内次秩序混乱，临时投奔该所妇孺计有二三千人。救济无数妇女脱离灾害，后再以无家可归难胞，即老弱病残者，收容334人。内分婴儿部，供给牛乳，贫儿及妇女部，供以膳宿兼施以教育，直办到1941年止。

日军进占杭州三个星期中杭州基督教会共收容难民1.7万人（内中有信徒、主要为妇女、儿童）经费由红十字及地方团体、商会等捐助，日军占领杭州三星期左右结束，难民自散，少数无家可归有家归不得的，分别集中青年会。蕙兰中学等处继续收容了一个时期。在1938年以国际救济会名义通过各教会团体调查记赈济贫民，发放米麦、面粉、棉衣、并举办“苦儿班”，中午供食一餐麦糊。为此，有多人加入教会，苦儿班按照小学课程进行文化教育，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停止。如杭州民众堂，于1939年冬季举办杭州民众堂冬赈所，收容一般贫苦居民，供给午餐，每日来所午膳者三百人。另外杭州沦陷后至1939年之前，广济医院院长苏达立联手杭州著名律师田浩征，医治了中国伤兵一千多人。

在国家危难之际，杭州基督教会利用自己特殊身份，以各种形式，积极投入了难民救济工作，并建立难民收容所，保护了成千上万的杭州难民，特别是妇女儿童，使他们免遭日军的蹂躏，成为该时期杭州基督教会的美好见证；同时也不能忘记曾经救助过、保护过杭州难民的外国传教士们。

## 十九. 《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在杭的住宅》

为了能在杭州长期传教，基督教各差会在杭城各地建立传教士住宅。在这次美国查档中，曾在杭州传教近四十年的美国传教士万克礼（Kepler Van Evera）的档案里，发现美国北长老会在杭城的住宅的老照片，这些老照片是笔者第一次看见，以前只听说美国北长老会有在杭州的住宅，也曾去探访过，因现房子以荡然无存，究竟房子是什么样子？规模和范围有多大？没有任何留下照片为证。这次看到这些照片正是如获似宝。下面来介绍一下。



左边张照片是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在杭城的住宅。从照片上看，这些建筑建好不久，一共有三幢自南向北排列的西式花园洋房，楼房式样别致，墙体灰色，有多扇百叶窗嵌在多面形墙体上，门廊外突，上方呈拱形，显得优雅而庄重；屋前有大片的草坪和树，住宅的环境优美，绿树成荫。总占地面积应该约有20多亩地。

美国北长老会差会的传教士住宅，原位于杭州雄镇楼车驾桥五福弄5号和12号（现为上城区江城路401号一带），建于大约1912—1918年间。在住宅南面有十数株高大的百年古树，其中有银杏、樟树、珊瑚朴、美国山核桃等，高达二、三十米。1947年中华基督教会浙江大会在这里成立。1951年交由中华基督教会浙江大会保管使用。3月1日起由中华基督教会浙江大会转交之江大学保管使用。5月10日，登记处批准之江大学作为举办文教事业之用。1951年秋，之江大学附中迁入五福弄新址，后来改为建华中学。1953年建华中学与邻近的私立民主中学合并，成为公立杭州第三初级中学（简称杭三初），后来逐渐变成的民居了。现仅存几株高大的乔木屹立及假山在那里，在这里建起古树公园，并恢复了月亮门。原来的三幢别墅已经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多幢高楼紧贴着古树公园，围得水泄不通。如果这些建筑和花园保存到现在，也是杭城独特一道风景线。

右边这张照片是美国传教士万克礼和夫人（波林·伍斯特 Pauline Wuster）在长老会住宅前月亮门口的合影。此照片拍摄于1946年。万克礼夫妇在这里生活、工作、传教将近四十年，是在杭时间最长的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之一。





这是二张图片是美国传教士万克礼的名片正反两面。正面是用中文写的，住的地址就是车架桥五福弄五号美国长老会住宅。反方面是用英文写的，上面是万克礼的英文名字；下方左面的英文翻成中文是“美国长老差会中国杭州；下方右边英文翻成中文是“纽约州纽约市第五大道156号”，笔者按这个英文地址在网上查寻，得知这个地址是美国长老差会在纽约办公大楼。因此，在美国的纽约和中国的杭州都能找到万克礼。



上面照片是杭州车架桥福幼儿园活动操照片。车架桥福幼儿园应该是教会的办的，地址就在长老会传教士住宅内。照片上将有100位左右的儿童分成两队，围城圈，在老师带领下一一起做操，他们活动的地方就在长老会宅前的草坪上。左边最边上有位老人面带微笑在观看，他就是万克礼。下面的照片是1948年12月10日，杭州车架桥福幼儿园全体



师生留念照。拍摄背景也在长老会驻宅前的花园假山内。万克礼夫妇（最后一排中间）也在其中。

万克礼（Kepler Van Evera）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于1883年4月9日，出生在美国爱荷华州的达文波特。他在一个农场的家长大，并接受基督训练，并很早对教会事工产生了兴趣。1907年，大学毕业，1912年毕业于芝加哥伊科米克神学院，后又获密歇根大学艺术学士学位。在他大学期间，他积极基督教青年会工作。并加入斯蒂文特志愿者组织，受到施佩尔博士的启发，接受外国传教士服务。1911年与波林·伍斯特结婚，并一起来中国。先在南京学习中文一年。1912年到达杭州开始传教。1930年开始，万克礼负责筹建鼓楼堂工作。直到1931年建成。

1937年12月24日上午八时杭州沦陷，万克礼担任“红十字会委员会”的司库，开展战时服务救助工作，并在五福路长老会住宅，办起收容所。不仅提供难民宿处，缺衣少被者还发给衣被，每日免费供餐两顿，又组织难民相互照料帮助；设立临时学校，由难民中学生和较有文化者担任教师；还有医护人员巡回医疗。1942年，因美日交战被遣返回国。

1945年抗战胜利后，又回到杭州，并担任浙江省国际救济委员会主席，他和他夫人为长期残酷战争的受害者，在物质和精神的需要提供服务，还参与杭州教会工作及乡村传福音的活动。1951年回美国，

同年10月10日退休。结束了40年的传教工作。1955年5月15日，在美国去世，享年72岁。

基督教（新教）传入杭州迄今有161年，为杭州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如教堂、教会学校、教会医院、教会大学等，但随着杭州的旧城的改造、城市建设、道路拓宽等因素，许多杭州基督教的历史文化遗产在这座城市已销声匿迹了，非常遗憾。笔者带领过基督教历史学者和传教士后代，寻访一些基督教遗迹，只能想象这里曾经有过的建筑。最近，思澄堂要进行一次大的修缮，修旧如旧，恢复原貌，并把思澄堂点点滴滴的历史文化，在这次修缮中能充分的展示出来，让人们能够追忆历史往事和提升杭州基督教历史文化品位，弥补一些历史遗憾。为此，笔者为这次思澄堂这样的修缮点个赞。

## 二十. 《大方井传教士公墓》

杭州是我国基督教传播较早的地区之一，大约元代初年（公元1278-1282年）基督教（当时称“也里可温”教）就在杭州最早传播。到了明万历十年（1582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来华传教，在他影响下入教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被教会称为“明朝三柱石”三位教徒中李之藻、杨廷筠二位是杭州人。他们入教后，在杭州邀请传教士来杭，并为租赁房屋，作为礼拜堂，从事布道。从此，天主教就在杭州传教。杭州几乎成为全国基督教中心，成为全国天主教传播的主要地区之一。

在这次查档时，发现有二张图片有关天主教的大方井传教士公墓。



上面照片是杭州大方井传教公墓的牌坊反面。这牌坊是典型中国式石制的，上面写着“我信肉身之复活”这句话出自基督教《使徒信经》中“我信身体复活”，这句话表示相信我们将与基督一同复活（林前15：1-58）。从照片上看，墓地周围环境杂草丛生，显得很荒凉。

我曾看到过一张由美国传教士甘博，在1917年拍摄的杭州大方井传教士公墓牌坊正面及墓室照片（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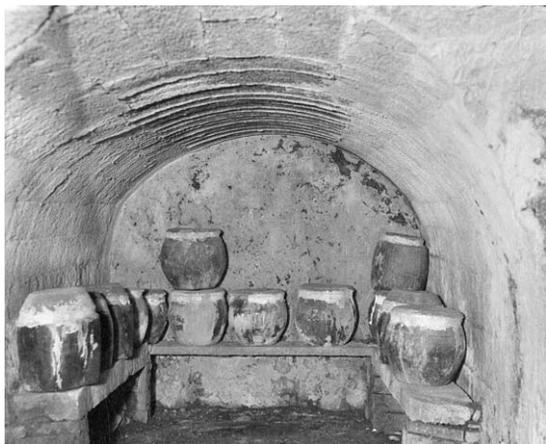
从这照片看到牌坊正面上面写着“天主圣教修士之墓”。牌坊后面就是具有欧式的墓室，墓室上面竖立十字架，有许多杂草覆盖，也显得很荒凉，是乎墓室周围已经很久没有人打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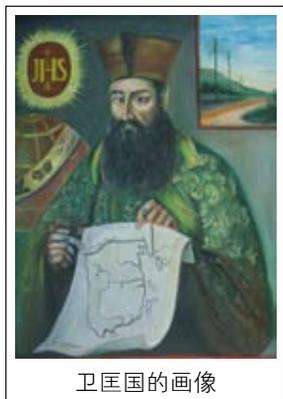
这张图片是大方井墓室内景的素写画。在图片上看到，欧式风格

墓室，里面堆积了十三个陶瓷的缸，每个缸里安放了传教士的遗骸。

我也曾看到过一张由美国传教士甘博，在1917年拍摄的杭州大方井传教士公墓内室照片（下图），比较清晰看到里面情景。



杭州大方井传教士公墓，原埋葬了自明清以来在杭州的十五位欧洲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有罗儒望(Joao da Rocha)、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黎宁石(Pierre Ribeiro)、徐日升(Nikolaus Fiva)、郭居静(Lazzaro Cattaneo)、伏若望(Jean Froes)、阳玛诺(Emmanuel Diaz,junior)、卫匡国(Martino Martini)、庞类思(Louis Gonzalez)等等。其中在杭著名人物是卫匡国。



卫匡国的画像

卫匡国是利玛窦逝世四年后的1614年，出生于意大利特伦托。卫匡国本名马尔蒂诺·马尔蒂尼(Martino Martini)。1632年，马尔蒂尼加入耶稣会，1638年，他被派遣去中国传教。同年12月，马尔蒂尼从热那亚启程，由于旅途遭遇风暴，他不止一次被迫返回里斯本。1640年到达印度果阿以后，又因为缺乏船只，等待了一年多的时间才重新上路，先后换乘了三艘不同的船只，最后于1643年越过重洋，来到澳门。第二年，他从澳门出发，越过梅岭，来到江西南昌、再顺长江而到南京。刚刚到达，就传来清军占领北京的消息，于是他沿大运河来到杭州。

1645年，清军攻占杭州。卫匡国被迫逃到浙江省于福建省交界山区。1646年，卫匡国重新回到杭州，一直到1650年，他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姓“卫”，名“匡国”，为“匡救国家”之意，“国”指的就是中国，号“济泰”，取“帮助、协助、救助”之意。卫匡国的号“济泰”，与利玛窦的号“西泰”遥相呼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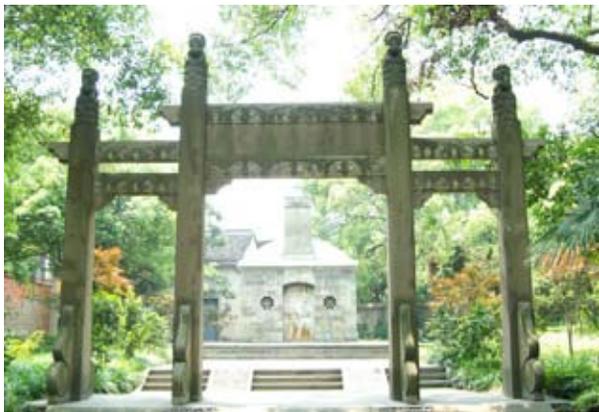
1650年，离开杭州到达北京，本想在北京协助汤若望工作，但汤若望怕他为明朝残余军服务过，被人知道，又因传教士内部内讧，又回到杭州。

卫匡国在传教期间先后到过杭州、宁波、金华、兰溪、广州等地。至少游历了中国15省中的7个省，为他以后绘制中国地图打下了基础。1651年因罗马天主教作出决定，禁止中国信徒祭祖、祭孔。在中国的天主教耶稣会得知消息后，派卫匡国作为中国教区的特派员返回梵蒂冈，为中国礼仪辩护，返回欧洲。1654年到达罗马。他向罗马教廷详细解释祭祖祭孔只是中国人的传统习俗，而不是宗教信仰。罗马教廷在听取了卫匡国的汇报后，于1656年作出了有利于耶稣会决定，允许中国信徒祭祖。1657年1月，卫匡国第二次前来中国，1659年夏天回到杭州。1659年，卫匡国在杭州兴建了天主教堂。1661年6月6日因病逝于杭州。安葬在老东岳大方井天主教墓地。1678年，由于大方井墓地过于潮湿，教会准备将传教士们的遗体移葬到新墓地中，卫匡国的棺材打开后，人们惊奇地发现，他的衣服保持原样，遗体也依然完好无损，只是缺了一只耳朵。卫匡国的遗体被移到新墓地的小教堂以后，被教徒们奉为圣物，“年中屡有人为之剪发修指甲，盥面整容，卧于木椅上，置于上层堂角，作共同祈祷状者”。直到1877年，由于尸体的腐烂加剧，教会才将遗体放入棺材，葬入墓地的教堂之内。

卫匡国在中国传播欧洲文化，并把中国文化介绍于欧洲各国，促进中西科学文化交流。他在历史学和地理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越的功绩，有《中国历史》十卷、《中国历史地理学》等著作传世，是继马可·波罗和利玛窦之后，对中国和意大利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和科学文化交流做出杰出贡献的一位重要历史人物。

欧洲传教士出来杭州时，并无专门的墓地，1627年，杭州天主教教友杨廷筠逝世，其次子把位于杭州古荡桃源岭下大方井的一块土地正式捐出来作为传教士的墓地。1676年，传教士殷铎泽把墓地进一步扩大，并建立造石墓窟一座，作为传教士公墓，于1678年，把分散杭

州各处的传教士遗骸迁葬。此后去世的传教士也被安葬在这公墓。在太平天国时期（1861-1864年），大方井墓地受到破坏，1874年对墓窟及牌楼的重修。文革时期再次遭到严重的破坏。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有关方面才发现墓地的重要意义，1985年，杭州市政府重修了大方井墓地，是按照历史资料复原的。



现大方井墓地是西溪路549号（杭州庆春宝药业公司旁），位于青山脚下，茂林掩映，环境幽静，旁边还有小溪流水。墓园占地148平方米。墓室前有中国式的石制牌坊，正面刻着“天主圣教修士之墓”，背面是“我信肉身复活”。墓室穹隆形的墓顶上竖着十字架。朝向西方的室门已经生锈，铁门上有锁。墓室前有两块石碑，碑上刻着墓主的姓名、国籍、生卒年、来华年份。石窟内部为欧洲风格，但其外表则为中国式，所以这是一个中西合璧的精美建筑。大方井传教士公墓为浙江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大方井是杭州现存唯一的一处传教士墓地，历经三百多年兴衰。这些传教士为了传扬天国的福音，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和杭州，并在中国传播欧洲文化，同时也把中国文化介绍于欧洲各国，促进中西科学文化交流，最后把自己的生命留在杭州这块土地上。因此，我们不能忘却这些传教士在中国和杭州所做的贡献。